

莊綬甲與常州學派

蔡長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研究莊綬甲的意義

近年來，筆者研究的重心，除了關注於經典的敘事與詮釋等相關課題之外，也致力於將經學史的研究，納入學術史研究的範疇中來思考。亦即筆者嘗試著將傳統與經典之學相關的各種表述形式，納入當時學術活動的脈絡中來考察。筆者認為，傳統學者的經學研究，當不止是孤立的對經典文本的訓詁注解而已，其所關注者多為當時學術界所共同關注之課題；其所研究之方法與呈現之內容，亦多可顯示出當時學術界之共性。故學者個人的經學研究，可以視為是當時學術界整體活動的有機組成，而表現在外者，則為多樣的學術形式：除了透過對文本的訓詁、考訂、輯佚、校勘等基礎工作，重新注解經典之外；也包括了以論說的方式，針對個別經學主題作專門而深入的探究；或是與同好對彼此共同關注的課題互相通信交流；或為在文集與學術札記中表答了對某種學術風氣的攻詰與贊許；或是在交流的過程中，體現了對前輩學者論點的承繼與發揮；或為對影響自身學術觀點之前輩學者的著作之蒐集整理與為之撰寫傳記等等。當然，也包括了同道相互間經術人品的評價在其中。凡此既為學者經學研究的一部分，亦是整體學術流變中的具體環節；而學者之間的交流，則彷彿是一面複雜的關係之網，交織成紛繁多姿的學術畫面。故觀察其現象，乃為一群體之學術活動；然探究其本質，則是圍繞各種與經學相關的主題之討論。

大略而言，為清代中葉學術界所集中討論，並形成共同之學術風氣與時代思潮者，主要表現為經典文獻的訓詁考據之學，以及伴隨而來的考據學方法論與考據學價值觀的擴散。除此之外，清代中葉以降，仍有相對於考據學以外的學術風

氣之形成。其中，最顯著者，當推常州學風。一般言之，常州學風之異於吳、皖、揚州者，除了可由《公羊》學及其後所衍生出的今文學派來觀察之外，具有濃郁的文人氣息，想要改變世界而非解釋世界的儒家傳統，尤其是藉由科舉制度的型塑而更形強化的儒家政治意識形態¹，當是推動常州學風成形最潛在而又最原質的力量，只不過因時代環境之異，相較於宋、明以來的理學經世之風，常州學風展現出更為獨特的面貌而已。當然，上述的解釋，不過是一種粗淺的觀察，想要得到堅強的論據，似仍須透過稍前所言，透過現象與本質之繫聯，摘錄並分析與常州學術群體相關聯的各種學術載體之內涵，以掌握常州學者經典研究的大方向，及其學術風氣形成之因。如此，再配合對常州學者經學專門著作進行爬梳與詮釋，則吾人觀照之視野當能有相對的擴大，也較能準確地為常州學者或常州學派的經學研究在當時乃至對後世的意義與價值，作出合理的說明，此即筆者所謂的學術史的思考。

一代學風由形成而興盛到衰亡，乃是一種動態的演變，基於上述之認識，筆者以為不但要觀察它循著什麼具體途徑而變動，也應盡可能地窮盡這些變動的細微周折。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每一位傳統學者的研究，似皆不可輕易忽視之，不論其經典研究成果的或高或低，其學術參與程度的或深或淺，窮盡其學行曲折，皆足以作為說明一個學術集團乃至一代學風之參考。而所謂時代思潮者，也正在前有大師之奠基，後有繼起者之推波助瀾中，呈現其發展之面貌。本文之撰作，正是基於上述理由為之。以本文所欲論述之莊綬甲為例，就作為常州學派的第三代成員而言，莊綬甲所面臨的形勢，與其父祖相較，可謂更形嚴峻。不但家族賴

¹ 克里斯多福·道森在《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一書中提到：「意識形態是人的產物，是有意識的政治意向試圖按照它的意圖來塑造社會傳統的工具。」換言之，意識形態是一種以行動為最後目標的信仰與價值系統，具有極大的社會學功能，如顏習齋所言「一人行之為學術，眾人從之為風俗」者。準此而言，中國歷代許多知識分子之藉由察舉推薦，或藉由科舉考試而投身於政治運作，應可視為是其儒家信仰或經學價值系統的最後目標或最高表現。擺開功利之徒不論，則儒者投身政治之目的，是欲藉此而來改變世界，如東漢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李膺、陳蕃、范滂諸人，此即所謂儒學經世者。故經典所描述的理想藉由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及推廣而滲透到現實生活的實踐當中，吾人或可視之為儒者的政治意識形態。參克里斯多福·道森著，長川某譯：《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另外，有關於意識形態之說明，請參季廣茂著：《意識形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余英時：《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再論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頁53-122。

以立身的科舉仕進之途，已無法在其兄弟行輩中得到有效的延續²，莊氏家族的學術理想亦因政治地位的低落，無法在高層的政治舞臺作充分有效的發揮³。如何在家族沒落的情況下，維繫家學傳統，是莊綬甲所面臨的嚴酷挑戰。因此，掌握了莊綬甲的學行經歷，將有助於吾人對常州學派作更深入的了解。換言之，研究常州學派，既可正面地從構成常州學派主體的莊存與、莊述祖、劉逢祿、宋翔鳳等人的學行經歷著手，以求其發展的大勢之外；亦可側面地從莊家子弟如莊綬甲、丁履恆等人的學行經歷中，觀察莊氏一族的興衰傳衍，以及莊氏家學由政治關懷轉向學術領域，並逐漸為人所知的過程；並且在莊氏家族與當時學術界的交流當中，看出具有文人特質以及以強烈經世之思為底蘊的常州學風；更可一窺考據學方法逐漸為常州學者嫻熟運用的事實，此亦筆者所謂的學術史的思考。

從現存文獻來看，莊綬甲的一生主要是為傳承與維護家族學術而努力。這一點，從他致力於整理與刊刻祖父的著作即可說明。雖然莊存與曾說劉逢祿他日必能傳己之學⁴，但在諸孫中，存與最寵愛者實為莊綬甲⁵。另外，即使莊述祖嘗云「吾諸甥中，劉申受可以為師，宋虞廷可以為友」⁶，然在莊氏家族第三代成員

² 按：「久困場屋」在當時可謂普遍現象，不獨莊氏家族如此，鍾彩鈞在〈宋翔鳳的生平與師友〉一文中，對此曾有精彩論述，並列舉數人為例以為說明，讀者可參。比較值得觀察的是，科舉程式在乾隆一朝的三次變革，明顯的是朝向有利於漢學（或經史實學）這一方面的發展，常州文人的科考成績從乾嘉之際開始呈下滑之勢，與此學術風氣之轉移似有內在之關聯。當時已有個別的鄉試主考官（如謝墉、朱珪、戴心亨等）嘗試以漢人經說命題，而常州文人學者也嘗試在考試的文章中加入漢學的見解，冀得考官青睞，臧庸與宋翔鳳即為顯例。不過顯然他們沒有阮元這般幸運，能得到像支持漢學的朱珪等人這樣的主考官欣賞。鍾彩鈞：〈宋翔鳳的生平與師友〉，收入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編：《清代學術論叢》（第三輯）（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頁167-168；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年），頁31-32；拙作：〈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以臧庸與李兆洛為討論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9月），頁263-303。

³ 有關莊氏家族學術與政治之關係，請參拙著：《常州莊氏學術新論》（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第3、4章。

⁴ [清]劉承寬：〈先府君行述〉，收入[清]劉逢祿：《劉禮部集》（道光十年劉氏思謨齋刊本），卷11附錄，頁1a-10b。（以下除有特別註明，凡《劉禮部集》皆用此一版本）

⁵ [清]劉逢祿：〈記外王父莊宗伯公甲子次場墨卷後〉，同前註，卷10，頁8b。

⁶ [清]宋翔鳳：〈莊珍藝先生行狀〉，《樸學齋文錄》（桃園：聖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浮谿精舍叢書》本），卷3，頁16b。（以下除有特別註明，凡《浮谿精舍叢書》皆用此一版本）

中，最爲莊述祖所賞識倚重者，實爲莊綬甲⁷。惜其家貧，客遊早逝，著作雖經其子莊潤整理，並由好友李兆洛代爲刊刻，然仍亡佚過半，且深埋於故紙堆中，未易一見。惟從殘存著作詩文及時人記載中，仍可鉤勒出綬甲之學行梗概，以爲觀察常州學派乃至常州學風之資，則是篇之作，亦所以發潛德之幽光也。

二、常州文人的關係之網

常州學派的奠基人爲莊存與，父莊柱，弟莊培因。存與有子三人，長逢原，次通敏，次選辰；培因有子一人，即述祖。綬甲爲逢原次子，在堂兄弟的排輩中居四，生於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卒於道光八年（戊子，1828），享年五十五歲⁸。生母顧氏，爲逢原側室⁹。毗陵莊氏是一個龐大的家族，在以追求仕進爲正途，奉行官方文化政策著稱的常州，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莊氏家族的勢力在乾隆中葉達到高峰，據《毗陵莊氏族譜》所載，合東莊、西莊計算，同時或前後在朝爲官者，即有十數人，其中尤以身居鼎甲的存與兄弟爲代表。莊氏家族以其優異的科舉表現，在乾隆初中葉間，曾歷經一段輝煌的歲月。綬甲祖父存與，高中乾隆十年（乙丑，1745）榜眼，官至禮部左侍郎，長期擔任皇家的家庭教師，擁有豐富的政治資源¹⁰；從祖培因，更於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大魁天下，旋以翰林院修撰赴福建主持鄉試，再以侍講學士督學福建，掌一省文衡。

⁷ [清]李兆洛：〈拾遺補藝齋遺書序〉，《養一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495冊影印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二十四年增修本），卷3，頁9a。按：述祖對綬甲在學術上的期望，將詳論於後。另外，綬甲之學行，頗爲李兆洛所敬佩，這一點在李氏的許多文章中可看出來；二人交誼篤厚，綬甲刊刻莊存與遺書，每請李氏提出整理意見，而李氏編纂《駢體文鈔》，亦請綬甲作序，乃至於綬甲身後著作，亦是李氏代爲刊刻，詳論於下。

⁸ 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養一齋文集》，卷14，頁42a。按：據《族譜》所載，綬甲字卿珊，然友輩多稱其爲卿山，亦有稱卿細者，此正如翔鳳字于亭，友輩有稱于庭、于廷、虞庭、虞廷者；另外述祖字葆琛，亦有稱以寶琛、保琛者；惠言字皋文，亦有稱以皋聞者；逢祿字申受，亦有稱以申甫者；周伯恬名儀暉亦有作儀煒者。而陸繼輅字祈孫，亦有稱其爲祈生者；陸耀通字劭聞，亦有稱其爲劭文者，此蓋友朋之間爲便於書信往來，取其同音之變通方式。筆者概依原文爲據，故以下行文將有「卿珊」、「卿山」……之異。

⁹ [清]莊貴甲、莊綬甲：〈顧太孺人事略〉，《毗陵莊氏增修族譜》（光緒元年刊本），卷20，頁11b。

¹⁰ [清]莊勇成：〈少宗伯養恬兄傳〉，《毗陵莊氏增修族譜》，卷30，頁29a；莊綬甲：〈味經齋遺書總跋〉，《拾遺補藝齋文鈔》（道光十八年李兆洛刊本），頁39a。

以其升遷之速，則出為督撫，入為六部臺閣，當可積年而至，不幸四十二之齡卒於學使任上¹¹。觀存與兄弟二人所以身居高位，正以其科舉成績優異，走的是翰林出身，快速升遷的清望之路。更何況除了莊培因及表弟錢維城這兩位受到乾隆欣賞的當朝狀元之外，又藉由姻婭之誼而得到當朝兩位大學士劉綸、劉統勳的支持，乾隆三十六年擔任會試副總裁（總裁為劉綸）、三十七年教習庶吉士，可以說是莊存與最風光的時候。不過隨著兩位當朝狀元的早逝，以及兩位大學士的相繼謝世，莊氏家族在朝中盡失支柱，後繼乏力，在於敏中、和珅相繼任大學士之後，莊氏二代子弟的翰林之路，幾已斷絕，如存與長子逢原，僅以舉人終老；其弟通敏、選辰，從弟述祖，雖亦進士出身，已無能躋身一甲之列¹²。再加上以經義取代駢辭表、判，移性理論至二場之末等科舉程式的變革，至乾隆晚葉形成一種有利於漢學的氛圍，不利向來在二、三場以駢辭麗語策論文章取勝的莊氏子弟發揮，故莊氏三代子弟的舉業之路，更顯艱困，如貴甲、雋甲等人，甚至連舉人都未考上，只有貢生、監生的出身；綬甲也不過多了一個州吏目的頭銜，與祖上顯赫的地位相比，實不可同日而語，頗有負先人命名勉其身居鼎甲之意。從《族譜》相關傳記行狀所載，可以感受到身居狀元第卻舉業無成的失落感，籠罩在家族第三代成員中。

然而，正如鍾彩鈞先生所言：「清代讀書人的正途是進士入仕，而對官宦世家子弟而言，除應試與遊幕之外，似乎沒有別的出路，因此不畏難的一再應考，是個普遍的現象。」¹³「告君窮達渾閒事，莫以糊名誤此生。」¹⁴這是宋翔鳳對綬甲的規勸，也可以視為官宦子弟的寫照。綜觀綬甲一生，即游走在應試與遊幕之間，生活的不安定，概可想見¹⁵。翔鳳在〈常州懷莊四綬甲劉六逢祿兩外兄〉詩

¹¹ 莊勇成：〈學士仲淳弟傳〉，《虛一齋集》（光緒九年刊本），卷首，頁1a-3b。

¹² 按：逢原為乾隆三十年舉人，官至全椒縣教諭；通敏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選辰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至內閣中書，早卒；述祖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至濰縣縣令。逢原未中進士，可以不論，其餘兄弟三人，皆未能進入一甲三名之列。選辰、述祖中進士又相繼在於敏中、和珅當權之時，二人皆未能進入翰林院。述祖之轉而以考據方法整理家族學術，與其無法進入翰林院有密切的關聯。其詳請參拙著：《常州莊氏學術新論》，第5章。

¹³ 鍾彩鈞：〈宋翔鳳的生平與師友〉，頁167。

¹⁴ 宋翔鳳：〈秋日懷人詩·莊卿山外兄綬甲〉，《憶山堂詩錄》（《浮谿精舍叢書》本），卷4，頁17b。

¹⁵ 按：與祖父輩不作第一人想的一甲進士相比，綬甲以諸生考取州吏目，常愧遺父、祖之羞，復以政治地位之喪失，致家道中落，乃如李兆洛所言「以貧故，時時客遊」、「奔走衣食，日月耗於道途」，綬甲甚至曾經擔任過龔自珍的家庭教師，文集中有〈題滬城秋興

中，有很深刻的描寫，詩云：

我來惆悵蘭陵道，官柳初殘雁早飛；酒熟何曾一醉醅，風多直欲成潦倒。
我愛莊周意最真，傳經劉向更無倫；尋常里巷過從慣，此日天涯各苦辛。
莊生囊筆遊閩海，海外詩成鬢應改；波濤滿眼自棲遲，文字依人足慷慨。
劉郎重繭走山東，垂白高堂憶朔風；舟行聞阻黃河決，涕淚麻衣路竟窮。
如此飄零更何已，我復蕭條行萬里；雲樹今年冷客袍，江湖何處逢知己。
楓落扁舟歲序侵，寒山寂歷寒江深；幾番鴻雁聞遙夜，各抱明明一寸心。¹⁶

詩中所描述者，實爲一幅莊氏家族第三代子弟淪落天涯的圖畫，真是「尋常里巷過從慣，此日天涯各苦辛」。劉逢祿因父歿於山東，故急往山東料理父親喪事；翔鳳則是將越重山之險，到雲南去探望父親；而綬甲則因家貧，應聘到福建當家庭教師，所謂「文字依人足慷慨」者¹⁷。不過，莊家子弟或因父、祖舉業成就之

圖》，序中即記丁丑（嘉慶二十二年，1817）秋爲龔閣齋觀察招致上海，此詩之作，乃因偕同龔自珍、段右白（段玉裁之子）、徐耕雲、金登園、吳南薌、朱檢之等人訪處士徐文臺，同遊菊舍，觀五石山房，並立石，自珍屬吳南薌補圖，綬甲繫之以詩。詩中並有小注言及「近向右白乞尊人茂堂先生《說文注》遺刻」。綬甲在龔自珍心目中分量匪淺，其名字常見於龔氏詩集中。如有詩云：「常州莊四能憐我，勸我狂刪《乙丙書》。」《乙丙書》即《乙丙之際箸議》。又其〈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有「勿數耄耋數平輩，蔓及洪管莊張周」之句，「莊」指的正是綬甲；其〈懷沈五錫東莊四綬甲〉則有「沈生飄蕩莊生廢」之句，對綬甲的際遇表同情之意。又據吳昌碩所記，龔氏所撰存與〈神道碑銘〉，即是據綬甲、翔鳳所述存與事蹟而成。另外，龔氏與劉、宋關係密切，載在其文集中，早爲世人所知。合而觀之，可以推知常州學派第三代對龔自珍由戴、段一脈走向發揮《公羊》大義，致疑劉歆《周禮》的學術轉向，皆曾發揮影響力。如自珍曾作〈祀議〉一篇以質胡培翬，並爲韻語記其事，詩中有言：「余生惡《周禮》，〈攷工〉特喜誦，封建駁子輿，心肝爲隱痛。五帝而六天，誕妄識所中，同時有四君，偉識引余共。」詩中顯示了對《周禮》及鄭《注》的負面批評，尤其對鄭玄言封建而駁孟子，又據讖緯以五天帝替代五人帝之說，反應最爲激烈。而所謂偉識與余共的「四君」，吾人可由詩末小注觀之，其言曰：「莊君綬甲、宋君翔鳳、劉君逢祿、張君瓚昭言封建，皆信《孟子》，疑《周禮》，海內四人而已。」顯示龔氏之批駁《周禮》鄭《注》，乃受到常州諸子的影響。莊綬甲：〈題滬城秋興圖〉，《拾遺補藝齋詩鈔》（道光十八年刊本），頁34a；〔清〕龔自珍：〈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之二、〈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懷沈五錫東莊四綬甲〉、〈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同年生胡戶部培翬集同人祀漢鄭司農於寓齋禮既成繪爲卷子同人爲歌詩龔自珍作祀議一篇質戶部戶部屬隱括其指爲韻語以諧之〉，《龔定盦全集類編》（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頁396、360、401、295、356。

¹⁶ 宋翔鳳：〈常州懷莊四綬甲劉六逢祿兩外兄〉，《憶山堂詩錄》，卷3，頁1b-2a。

¹⁷ 按：旅食四方，不獨綬甲爲然，逢祿、翔鳳及常州乃至大江南北的同輩友朋，多有類似情況。劉承寬即云：「府君以名門之子，早負重望，屢困場屋，又拙謀生，喪葬之事，積載瘁瘳，兩浙、廣陵，連年旅食。」劉承寬：〈先府君行述〉，卷11附錄，頁2b。

蔭，故所至之處，人爭禮聘，蓋重其家傳文章之學也。如逢原，貴甲形容云：「專力於經籍，爲文務收攬含蓄，醇正和平，不苟爲驚炫藻飾，每身遇繁劇，沉思腹稿，不刻而就，或窮日累夜，始成一藝。甫脫稿，人爭傳錄之。」¹⁸又云：「都中爲南北人文所集，府君居其間，訥訥如不出口，至講學考業，及有質問者，口對響應，無所窮。酒食遊戲之會，未嘗偶與，京師鉅公莫不推重府君，爭聘爲經師。」¹⁹而綬甲則是「以貧故，時時客遊，所至倒屣，無不敬而暱之」²⁰。

當然，遊食四方，可謂最不得已，士子所不忘者，仍以功名爲念，並有讀書會的組織存在，定期或不定期的聚會，相互研討，相互激勵。乾嘉之際的常州府最著名者莫過於愛日草堂之會。從現存常郡文獻中，很容易見到愛日草堂的記載，如李兆洛〈江陰順三坊祝君年六十五行狀〉云：

（祝君）所交者，江陰則夏獻之祖瓚、汪澗門道平、夏循陔翼朝、季仙九芝昌；郡中則錢魯思伯垌、張皋文惠言、惲子居敬、孫訪山讓、張翰風琦、莊傳永儀曾、李鹿籽慶來、丁若士履恆、陸祁生繼輅、陸劭聞耀適、劉中受逢祿、莊卿珊綬甲、周伯恬儀暉、黃小仲乙生、趙子述學彭、魏曾容襄、吳碩甫特徵；宜興則吳仲倫德旋；歸安則姚聖常晏；山陰則蕭子滂以霈；吳江則吳山子育；歙則金朗甫式玉，皆金石不渝者。尤重皋文、子居，有所爲，必取正焉。君所居曰愛日草堂，諸君子自郡中至，常館之；君亦樂至郡就諸君子譚集，流連信宿，迭相爲賓，斐然以發名成業相砥礪。²¹

行狀主人爲江陰祝筱珊。文中所記，主要是常州府及其下轄縣治之同好者，而所謂以發名成業相砥礪者，其目的仍是以科名爲念。另外，郭嵩燾《日記》則專記出身於常州府的草堂諸子，如周儀暉、李兆洛、祝百十、張惠言、張成孫、陸繼輅、陸耀適、莊綬甲、劉逢祿、洪貽孫、丁履恆等，並稱乾嘉之際，士皆尙文章，馳婺聲利，於時常州尤獨多文士。而草堂諸子獨以立身砥行相爲磨切，風尙爲之一變²²。陸寶千認爲，常州學派之萌坼，始於諸君子的草堂之會，其言頗具

¹⁸ 莊貴甲等撰：〈先考匯川府君行述〉，《毗陵莊氏增修族譜》，卷20，頁9a。

¹⁹ 同前註。

²⁰ 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卷14，頁41b。

²¹ 李兆洛：〈江陰順三坊祝君年六十五行狀〉，同前註，卷14，頁38a-b。

²² [清]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6。

啓發性²³。諸子的聚會，當然是以切磋舉業、砥礪德行爲主要目的，然而貫串於諸子內心深處者，乃是儒家鮮明的入世抱負，世人每以常州學派具有強烈的經世之志，筆者以爲其故在此。至於支持此一經世情懷的背後動力，則是以常州特有的經學學風爲轉移之具，再往前一步來觀察，則是與常州的科舉文化密不可分，亦即與舉業結合的常州經學，具有鮮明的政治、社會動能，而不純然是知識學背景的產物，此一現象與主要立基於知識層面作學術考索，並逐漸展現其影響力的考據學風，有本質性的差異。所以，草堂諸子乃至其常州前輩的功名之念，在利祿追求的背後，尚有一儒者經世的根本動力。其經世精神，或所謂儒家之意識形態，展現於常州學術文化，而與歷代儒者及當世考據之風相異者，正如陸寶千所言，其一爲使《公羊》之學「經世化」；其二爲古文之「經世化」，如阮元所謂「以經術爲古文」者²⁴，即不取理學文以載道之說，而代之規模兩漢文章的援經議事；其三爲詞學之「振衰」，使言詞而寓意內言外之旨及比興寄託之志。簡言之，亦經世精神之表現也²⁵。

掌握了常州士子的經世性格，再來看莊綬甲的交遊。其實，草堂諸子的姓名，不但互見於常州學者的文集之中；而且綬甲的交遊群，也大致不出草堂諸子的朋友師弟這一範圍。例如綬甲有詩題曰：〈甲戌小除夕，虞廷歷黔、楚、燕、秦、齊、魯而歸，過舍小駐，招同祈生、伯恬、山子、晉卿、孝逸、幼懷、仲遷小飲，同賦，因憶若士先生、子常、秀翰、輕風、申耆、劭文、孟慈、申受、曾頌，並懷亡友皋文、從子傳永，兼示彥惟、君祐。時余歸自白下、祈生歸自都中、伯恬歸自齊、山子歸自皖、晉卿歸自豫、仲遷歸自蜀、若士先生官贛榆、子常里居江陰、秀豐客無爲、翰風客洛陽、申耆以父喪去官滯鳳臺、劭文客長安、孟慈謁選京師、申受以庶常假客青浦、曾頌以母喪去官滯睢州、彥惟客青浦、君祐客洛陽，得瘵疾，聊志蹤跡〉²⁶，詩繫於嘉慶十九年，是歡迎翔鳳遠遊歸來之作，綬甲所招所懷，盡是少時同心之友，這些人也是愛日草堂的中堅，稱丁履恆爲先生者，乃因丁氏不但是綬甲的親姐夫，更是他的授業師，終綬甲一生，皆以師禮待若士，載在李兆洛所撰〈行狀〉內。另外，劉承寬在〈先府君行述〉中提

²³ 陸寶千：〈愛日草堂諸子——常州學派之萌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6月），頁67-83。

²⁴ 〔清〕阮元：〈茗柯文序〉，〔清〕張惠言：《茗柯文》（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卷首。

²⁵ 陸寶千：〈愛日草堂諸子——常州學派之萌坼〉，頁79。

²⁶ 莊綬甲：《拾遺補藝齋詩鈔》，頁22a。

到逢祿的交遊云：「同志中與共習莊氏學者，則有若莊君綬甲兄弟、宋君翔鳳、丁君履恆；其共習張氏學者，則有若張君琦、其姪成孫、其甥董君士錫；其束髮以學行相砥礪者，則有李君兆洛、惲君敬、陸君繼輅、周君儀璋、李君復來。」²⁷ 顯示逢祿的交遊群體亦大體不出愛日草堂諸君。而翔鳳在〈吳嘉之詩序〉中云：「余外家在常州，少壯時往來其間，凡訓故詞章之士無不與交，而所學無不相合。」²⁸ 在翔鳳的詩文集中，也留有許多與常郡文人學者往來的記錄，如趙懷玉、惲敬、孫星衍以及草堂諸子如周伯恬、陸繼輅、陸耀燾、吳育、丁履恆、李兆洛、莊綬甲、劉逢祿、李復來、李慶來、張琦、洪孟慈、方履錢等。至於李兆洛的交遊群，也大致與綬甲、逢祿、翔鳳相當²⁹。另外，丁履恆《思賢閣詩文集》所載與常郡文人之往來，大體亦不出翔鳳、綬甲、李兆洛之範圍³⁰。而即使陸繼輅在推薦纂輯省志的人選時，所舉亦是李兆洛、丁履恆、莊綬甲、宋翔鳳、沈欽韓、董士錫、方履錢、吳育、周伯恬、顧蘭崖、張成孫、陸耀燾等人，並稱許諸子是方今之「珪辭樸學」³¹。文獻顯示，清代中葉的常州學者，絕非孤立的個體，而是經常聚會，互相砥礪德行、切磋學問的學術群體。以故鋪墊在常州學派經說議論之底層者，乃是常州眾多學者心力匯聚而成的學術精神；而其展現途徑，主要顯示在經學、詩詞與古文的創作之上，而貫穿於三者之間者，則為其具有鮮明

²⁷ 劉承寬：〈先府君行述〉，卷11附錄，頁8a-b。

²⁸ 宋翔鳳：〈吳嘉之詩序〉，《樸學齋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504冊影印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浮谿精舍叢書》本），卷2，頁33a。

²⁹ 如蔣彤云：「同時如周伯恬先生儀璋、莊卿珊先生綬甲、劉中受先生逢祿、董晉卿先生士錫、陸祈生先生繼輅、紹開先生耀燾、張翰風先生琦、洪孟慈先生飴孫、李鹿軒先生慶來、心陔先生復來、董方立先生祐誠、魏尊容先生襄、無錫薛畫水先生玉堂、宜興周介存先生濟、江陰祝子常先生百十、吳江吳山子先生育、元和沈小宛先生欽韓、涇縣包慎伯先生世臣，並先後與訂交」。又黃體芳云：「生平交遊皆一時名宿，若顧氏廣圻、劉氏逢祿、莊氏綬甲，專精經術，校正古書。」〔清〕蔣彤：〈養一子述〉，《丹棧文鈔》（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叢書集成續編》，第141冊影印《常州先哲遺書》本），卷3，頁25b；〔清〕黃體芳：〈養一詩集序〉，《養一詩集》（光緒八年刊本），卷首，頁1b。

³⁰ 事實上，從洪亮吉、孫星衍、趙懷玉、惲敬、張惠言、張琦、莊綬甲、劉逢祿、宋翔鳳、李兆洛、丁履恆、陸繼輅、陸劭聞、董士錫、周伯恬等人的詩文集中，皆可發現此一常州文人集團的存在，關於此點，亦可參張廣慶、鍾彩鈞對劉逢祿、宋翔鳳師友交遊的介紹。張廣慶：《劉逢祿及其春秋公羊學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武進劉逢祿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鍾彩鈞：〈宋翔鳳的生平與師友〉，頁157-176。

³¹ 〔清〕陸繼輅：〈上孫撫部書〉，《崇百藥齋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97冊影印道光四年合肥學舍刻本），卷3，頁19a。

的政治、社會動能的經學觀。而這一切，都與莊氏學術密不可分。至於其具體的傳播途徑，可以透過對莊綬甲學行經歷的考察，來加以說明。因為，莊綬甲既是身為廣泛的常州士大夫群體的一分子，也是常州學派第三代的重要人物。從對莊綬甲學術行誼的考察中，可以清楚看到一個共習莊氏學的核心集團，而這些共習莊氏學的同心之友，不但將莊氏學術發揚光大，並且將莊氏之學術精神運用到詩詞與古文創作中，成就知名的常州詞派與陽湖文派。另外，透過這個核心集團，我們更可以看到考據學方法與莊氏學術融合的過程。所以有必要對於莊綬甲這樣的關鍵人物，以及對於這一段莊氏學的傳播歷程，做詳盡的考察。且觀李兆洛之言：

（綬甲）又承師論交，博訪孤詣如張編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劉禮部申受、宋大令于廷、董明經晉卿諸子，無不朝夕研詠，上下其議論，蓋庶幾於好學不倦，篤行不困者焉。³²

上述諸人加上李兆洛，就是與綬甲共習莊氏學的同心之友。莊氏之學的傳播與常州學派的開展，諸子居功厥偉。首先是張惠言。從稍前所引綬甲詩作可以看出，即使惠言已辭世多年，綬甲仍對其懷念不已。在張氏的《茗柯文》中，有兩篇文章是與綬甲直接相關的，其一是稍後將要討論的〈答莊卿珊書〉，在信中對綬甲勉勵有加；其一則為〈遷改格序〉。《遷改格》是綬甲與陸耀遙「取明人《功過格》，正之以禮，明其統例，名之曰『遷改』」。而惠言則據《易經》所言遷善改過之義序之³³。雖然二人文集中，少見論學之語，然惠言與莊氏家族成員，卻有深厚的學術淵源，尤其是與莊述祖的交往，為其所治《虞氏易》帶來《公羊》學的身影，盧鳴東即從「受命改制」、「三代正月」、「文質禮變」三個主題討論張惠言帶有《公羊》精神的《易》象論述³⁴；另外，據文獻所示，述祖曾與張惠言共治《說文》諧聲之學，述祖曾傳此學問於丁履恆、莊綬甲、劉逢祿，在惠言即世之後，又傳此學於惠言子成孫。在劉逢祿及惲敬的文章裏，都提到述祖精於古韻的分部，惲敬更提到述祖曾將古韻分為十九部，以小篆寫之，未竟其業，而由惠

³² 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卷14，頁40b。

³³ 張惠言：〈遷改格序〉，《茗柯文》，第2編，卷上，頁32b-34a，引文見34a。又按：「功過格」概念的產生大約始於元代，而盛行於明代，有關功過格之的文化意義，請參高羅佩著，李零、郭曉惠等譯：《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27-334。

³⁴ 盧鳴東：〈取象釋禮：張惠言《虞氏易禮》中的《公羊》思想〉，《新亞學報》第23卷（2005年1月），頁167-192。

言續成之，復析爲二十部³⁵；而逢祿則概以二十部目之³⁶，顯示他將此視爲莊氏、張氏二人共有的成就。陳新雄先生曾介紹張惠言、莊述祖、劉逢祿古韻分部之說，以爲與張氏古韻學說極爲相近者，則爲莊述祖³⁷。然據惲敬所言可知，《說文諧聲譜》實莊、張共同之創作，或者可以說是述祖奠其基，而由惠言賡續者³⁸。今觀其別泰、怪以下五韻自爲一部，其說即本莊述祖³⁹。尤有說者，莊氏、張氏、劉氏論古韻皆推《三百篇》而斥《廣韻》，亦可以見其一脈相承之理路。更重要的意義是，常州在莊述祖、張惠言之前，學者如孫星衍、洪亮吉對於考據學方法的運用，似偏於《說文》字形之運用，其能系統的運用古韻學知識討論學術者，或始於莊、張二人。

張惠言另一可以討論者，是他與劉逢祿的關係。劉承寬說：「(逢祿)年二十又七，入都，……始識張先生惠言于都，與譚《周易》、《三禮》之學，旋省親于山東書院而歸。」又云：「大抵府君于《詩》、《書》大義及六書小學，多出於外家莊氏，《易》、《禮》多出於皋文張氏。」⁴⁰戴望亦據之而云：「嘉慶五年，年二十有五，舉拔貢生，旋入都應朝考(嘉慶七年)，時文定公及世父侍郎故舊徧京師，先生不往干謁，唯就張編修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竟以此被黜。」⁴¹蓋二人皆以逢祿《易》、《禮》之學出張皋文⁴²。然據逢祿〈歲莫懷人雜

³⁵ [清]惲敬：《說文解字諧聲譜序》，《大雲山房文集·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82冊影印《四部叢刊》本)，卷3，頁13a-14b。

³⁶ 逢祿之言曰：「金壇段氏分十七，曲阜孔氏分十八，武進莊氏、張氏分二十，高郵王氏分二十二。」至於逢祿則將古韻分爲二十六部。劉逢祿：《詩聲衍序》、《詩聲衍條例》，《劉禮部集》，卷7，頁1a-4b、9a。

³⁷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頁415-454。

³⁸ 按：《說文諧聲譜》惠言亦未成而卒，乃由述祖指導張成孫續成之，改名曰《諧聲譜》。張成孫：《諧聲譜自序》，《端虛勉一居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叢書集成續編》，第135冊影印《常州先哲遺書》本)，頁4b-5a。

³⁹ [清]丁履恆：《形聲類篇》(《續修四庫全書》，第247冊影印光緒二十二年《倭漢齋叢書》本)，卷上，頁40b。

⁴⁰ 劉承寬：《先府君行述》，卷11附錄，頁2a-5a。

⁴¹ [清]戴望：《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謫麟堂遺集》(宣統三年歸安陸氏依會稽趙氏本刻)，卷1，頁23b。

⁴² 另外翔鳳有詩云：「張君注《易》時，吾曾預親炙，今存卯金子，人海一魁碩。」而李兆洛亦言：「中交張翰林皋文共通虞氏《易》，爲〈六爻發揮旁通表〉、〈虞氏易變動表〉、〈卦象陰陽大義〉、《易言補》、〈易象賦〉、〈卦氣頌〉，凡五卷。」言下之意，蓋亦以爲逢祿之《易》淵源於張氏。宋翔鳳：《論易一首贈姚仲虞》，《洞簫樓詩紀》(《浮谿精舍叢書》本)，卷11，頁17a；李兆洛：《禮部劉君傳》，《養一齋文集》，卷14，頁1b。

詩十六章》之九云：「憶昔初入都，姝子守金閨；問《禮》喜得師，良友如壘篋；童烏能問字，神駿生渥注；忽忽十數年，流轉各天涯；夔曠不相遇，韶舞爲誰攜；鄭音易爲好，趨舍惟自知。」其下自注云：「壬戌之春，見茗柯先生，談《禮經》最樂，時董晉卿在甥館，江安甫已沒，彥惟幼稚也。」⁴³則是逢祿自言入都所問者，惟《禮》而已。文獻顯示，逢祿於嘉慶七年（壬戌，1802）春天始入都，結識這位久聞其名的同鄉前輩，問題是逢祿「旋省親於山東書院而歸」⁴⁴，而張皋文則卒於同年夏六月⁴⁵，是逢祿與張惠言的接觸，僅能在嘉慶七年春天短短旬月間，則其與惠言談論者，或僅如逢祿所自言之《禮經》而已。至於《易》學，據逢祿所撰〈虞氏易言篇後記〉所云：

初張皋文先生述《易言》二卷，自〈震〉以下十四卦未成，而先生沒。其甥董士錫學于先生，以余言《易》主虞仲翔氏，于先生言若合符節，屬爲補完之。……祿學識淺陋，又未嘗奉教先生，僅僅窮數日之力，以先生所爲《易說》，竟其條貫而爲此，稍爲疏通證明之，庶于師法少所出入，其于先生之意有合有否，則不敢信焉爾。嘉慶七年冬十月，劉逢祿并記。⁴⁶

逢祿撰此文，距惠言之逝，不過四月，記憶猶新，然僅自言於《易》主虞仲翔氏，與張皋文若合符節；又自言未嘗奉教於張惠言；所爲之《虞氏易言補》，亦僅就皋文之《易說》竟其條貫，稍爲疏通證明而已，則逢祿之《易》學未必出自皋文。且逢祿文集卷一有〈易象賦〉、〈卦氣頌〉，其〈易象賦〉主要是在闡發孟氏、虞氏之《易》蘊，此或即董士錫認爲逢祿言《易》主虞仲翔氏的原因；至其〈卦氣頌〉，則是引用存與的《易》學著作如《卦氣解》、《八卦觀象解》之說爲注解。蓋存與論《易》，實能綜孟、虞二家之說，而逢祿亦能引存與之說闡此二家，然則逢祿之《易》學，實具外家身影，只能說與惠言所論若合符節，不必爲得自惠言者。更何況惠言言《易》，既受述祖《公羊》之說影響，其注《虞氏易》，亦非閉門獨造，而是有莊氏學者參與，如翔鳳即言「張君注《易》時，吾曾預親

⁴³ 劉逢祿：〈歲莫懷人雜詩十六章〉之九，《劉禮部集》，卷11，頁13b。

⁴⁴ 劉承寬：〈先府君行述〉，卷11附錄，頁2a-5a。

⁴⁵ 惲敬：〈張皋文墓誌銘〉，《大雲山房文彙·初集》，卷4，頁23b；阮元：〈張惠言傳〉，《碑傳集》，（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清代傳紀叢刊》，第113冊），卷135，頁1a-2a；〔清〕吳德旋：〈張惠言述〉，《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清代傳紀叢刊》，第150冊），卷132，頁40b。

⁴⁶ 劉逢祿：〈虞氏易言篇後記〉。按：《劉禮部集》本〈易言篇〉末跋文未載「嘉慶」以下十二字，此文所據爲李兆洛養一齋校刊本《虞氏易言補》所附，題爲〈虞氏易言後記〉。詳細分合情形，請參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頁48。

炙」⁴⁷，則其治《易》而講求微言大義之精神，不可謂未沾染莊氏學風。至於《三禮》之學，本莊氏學問之大宗，而為存與所最早致力者⁴⁸，存與《禮》學著作除《周官記》、《周官說》外，《味經齋遺書》中時有駁鄭玄《禮》學的言論⁴⁹，這方面既為逢原、述祖、綬甲所繼承，並撰有著作⁵⁰，以逢祿對外家學術認知之深，不可謂未聞其緒論，故逢祿於見惠言之前，必有受於外家《禮》學，且有相當的根柢，方有能力與張惠言談論繁難之《禮》學。更何況除了受到金榜影響之外，張氏言《禮》學，由常州學者彼此頻繁的交往情形來看，也可能有與莊氏學者討論而得者，張惟驥稱惠言「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康成，微言奧義，究極本源。於古今天人之統紀，言之皆親切有味。」⁵¹張氏自「微言奧義」以下的評論，不難看出帶有幾分莊氏學之身影。所以觀察張惠言的《易》、《禮》之學，實有助於吾人思考常州學風與吳、皖不同之處，即方法相同，然歸宗不同也⁵²，至於常州詞派大闡意內言外之旨，與莊氏論經典講求微言大義之間的關聯，已有學者指出⁵³，此處不再贅述。

另外，與綬甲朝夕研詠，上下議論者，還有丁履恆。眾所周知，龔自珍著名的〈常州高材歌〉所贈予的對象即為丁履恆，即此亦可推知丁氏在常州學派的位置。雖然文集中師弟之間的交流並不多見⁵⁴，然二人密切之關係還是可以從其他

47 宋翔鳳：〈論易一首贈姚仲虞〉，卷11，頁17a。

48 莊綬甲在〈周官記跋〉、〈味經齋遺書總跋〉二文中，兩次提到存與治經，最先致力於《禮》。

49 最顯著者為《周官記》、《周官說》及《毛詩說》，讀者可覆按。

50 按：逢原撰有《詩鄭箋正謬》、述祖有《毛詩周頌口義》、綬甲有《周官禮箋》，皆涉及對鄭氏注《禮》之探討。

51 張惟驥：《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上海：常州旅滬同鄉會，1944年），上冊，卷6，頁4b。按：惠言《易》、《禮》之學與《公羊》學的關係，詳細討論，請參盧鳴東：〈取象釋禮：張惠言《虞氏易禮》中的《公羊》思想〉，頁167-192。

52 按：此處所言，僅為討論綬甲與張惠言關係時的附帶之論，逢祿與惠言學術是否有傳承關係，仍有待於藉由細部分析其文本方能得之。

53 吳宏一：〈常州派詞學研究〉，《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94。

54 按：綬甲詩集僅一及丁氏（已見前引）；文集則在〈上孫觀察星衍書〉中言及自己最近和丁道久師、沈君夢蘭討論治河宜復古道之計；丁氏《思賢閣詩文集》亦僅在詩作（〈上巳日同人重集花嶼仍疊前韻並序是日寒食〉「惆悵言詩孰與商卿山未與斯會。」）、詞作（〈摸魚兒辛巳花朝，與岷山、卿珊、曾容、小松、晉卿……小集花嶼讀書堂，同人賦詩，予填此詞〉）的間注或小序中提及綬甲，倒是在文集中留有許多與綬甲堂兄弟如傳雲、傳永、佑平等人的通信，內容亦多砥勵德行學問之語，也在不少詩作中提及逢祿、翔鳳；至於逢祿與

文獻得到補充說明，例如張惠言的〈答莊卿珊書〉，信中惠言提及到京師後，「鄉里之賢士，聞其名者多矣，嘗恨不及知而友之，其或見之而無恨于不知者，乃亦多有。」又說：「其慕而友之者，卒歲不過三四見，又嘗自恨友之而不足知之，與向之不得友之也，無有異。」言下之意，大有這些所謂的鄉里賢士，徒具虛名，實寓見面不如聞名之意。惟獨言與「與道久（履恆）居三十日，自以為知之。其聰敏特達，志氣激發，昭昭然在三代之上，庶幾聖人之所為進取者。僕既得其為人，稠人廣眾之中，率語之以自壯」。可見惠言對丁履恆頗致推崇之意。又言：「吾子在諸君子之中，內重而外厚，最可一望而識，又學于道久，議論性術，一宗于師，僕之于知吾子也，自以為差易，而又堅之以道久，則吾之信于吾子者，其亦有以得之矣。」⁵⁵其意謂綬甲性情敦厚，又從學於丁履恆，則亦庶幾乎聖人之所為進取者也。最後惠言勉勵綬甲云：

自古非才之難，成之實難，其于今尤甚，何者？貧窮迫其中，而誹譽敗其外也。然天下之事，無藉為之則已，為之有異于古乎哉？幸而不為其事則已，為之不必于古之人之為之乎哉？才之，天也；成之，人也。在天者，道久之與卿珊皆是矣；在人者，道久之與卿珊之志皆是矣。二子者之成豈不謂難哉？然吾謂二子者有其志，則眾人之所難者不足以難之，而二子者之不負乎其志，抑為難也。⁵⁶

從惠言勉勵綬甲的話語推之，吾人可以更清楚掌握郭嵩燾所云草堂諸君子獨以立身砥行相為勸切者，所指為何。事實上，丁履恆不但是典型具有經世之思的常州文人⁵⁷，也是綬甲的姐夫暨啟蒙師⁵⁸，更是與綬甲共學莊氏學者⁵⁹，丁氏發揮存與

翔鳳，在詩文集中，亦皆留有懷念丁氏之作，如逢祿有〈歲莫懷人雜詩十六章〉，其第五章所懷念者即丁履恆；翔鳳一系列的〈秋日懷人詩〉中，即有一首題曰「丁道久明經」；翔鳳另有〈兩阻贛榆訪丁道久履恆不值寄宿學舍作此〉。

⁵⁵ 張惠言：〈答莊卿珊書〉，《茗柯文》，第2編，卷下，頁5b-6a。

⁵⁶ 同前註，頁6a。

⁵⁷ 吳育言：「錢塘盧弨弓、金壇段若膺、滄州李甯圃、同縣莊寶琛、張皋文、惲子居皆其師友，文章學術，淬厲磨濯，於漢、宋諸儒，必求有得於心，不務立門戶，嘗磊落有經世志，益講求農田、水力、錢法、鹽政、兵制，著為論說，以待求取。……君嘗好宋韓、范、富三大臣集，語余之三公者，非獨功在天壤，觀其書，尤不可及，蓋深有意其為人也。嗚呼！使君而果用之，以方剛之氣，其設施或有可觀，乃不果用，及莫年精已銷亡之後而用之，尚何益哉！尚何益哉！」從這一段記載裏，吾人可以了解到經世，或為世所用，可以說是丁氏一生中最大的願望。事實上，從莊存與、莊述祖、莊綬甲、張惠言、惲敬、李兆洛、丁履恆、劉逢祿、董士錫諸人的傳記中，作傳者每每指出傳主不為世用的遺憾。可見經世，為世所用，對所思皆在藉科舉晉身的常州文人而言，是其處

之學者，有《春秋公羊例》⁶⁰；守述祖之說者，有《形聲類篇》、《說文諧聲》等⁶¹。其他專著則有《左氏通義》、《毛詩名物志》，詩文則有《思賢閣詩文集》、《守韻齋集》，《倚聲寫韻齋詞稿》，另有《望雲聽雨山房劄記》、《愛日堂自治官書稿》、《宛芳樓雜著》等，為治常州莊氏之學而甚少有人注意者⁶²。

董士錫是另外一個與莊氏家族關係密切的學者，他是張惠言的外甥，也是莊述祖與張惠言的學生。現存董氏與莊氏學術關係最密切的文獻，應是他為存與《易》學著作所寫的〈易說序〉。此文之所以重要，乃因董氏提出三個至今觀之，仍是非常鮮明的論點，為吾人思考莊氏乃至常州學術之精神，與考據學相異之處，提供了線索。首先，董氏將莊氏之學與乾嘉考據之學對立起來，他說：

本朝經學盛于宋、元、明，非以其多，以其精也。乾隆間為之者，《易》則惠棟、張惠言；《書》則孫星衍；《詩》則戴震；《禮》則江永、金榜；《春秋》則孔廣森，小學則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皆粲然成書，著于一代。而其時莊先生存與以侍郎官于朝，未嘗以經學自鳴，成書又不刊

世立身第一義，其次才是學者的身分。也正因此一特質，使其即使討論學術，亦不以知識的客觀性為第一義，而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清〕吳育：〈教授文林郎山東肥城縣知縣丁君家傳〉，《思賢閣詩集》（咸豐四年刊本），卷首，頁1b-2a。

⁵⁸ 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云：「君子師友誼甚篤，若士，君姐壻也，君少從問業，終身執弟子禮甚恭。」（卷14，頁41b）

⁵⁹ 劉承寬：〈先府君行述〉，卷11附錄，頁8a-b。故李兆洛於〈珍藝宦遺書序〉中乃云：「若士、中受所著《公羊》，多本宗伯（存與）；卿珊搜覽漢學，亦能紬繹先生（述祖）之旨。」李慈銘於《越縵堂讀書記》引之，而稱「李氏兆洛序《珍藝宦遺書》，稱莊氏又有若士、中受兩君，皆著《公羊》學，不知其名，蓋皆宗伯之孫。」〔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臺北：世界書局，1975年〕，中冊，頁821）其實丁若士是存與的孫女婿。

⁶⁰ 按：丁氏文集卷二有多處提及治《公羊》學及論治經應有之態度，如〈與（莊）傳雲〉、〈與（徐）仲平〉、〈與董宗邵書〉等。另外，丁氏孫紹基跋云：「先大父……平生撰著甚富，於諸經中，尤深《春秋公羊》學，創著《釋例》，未及卒業，會劉中受先生亦治《公羊》，遂以藁本相屬。」（《思賢閣文集》，卷2，頁4b、12a、29b；附錄，頁1b）

⁶¹ 按：述祖分古韻為十九部，丁氏《形聲類篇》亦分古韻為十九部，並在〈復王懷祖先生書〉中云：「今蒙進而教之，益不勝雀躍，鶴望尊指，分二十二部，祭、月別出，發端先生，幸得承教，其于鄙見十九部中，復出至、質一部，緝、盍二部，恆心知其是，顧尚未重加搜討，未敢強為苟同。」（《思賢閣文集》（咸豐四年刊本），卷2，頁23a-b）顯示出他對分古韻為十九部的堅持。

⁶² 按：丁氏行世之作，除了《形聲類篇》、《說文諧聲》之外，尚可見《思賢閣文集》四卷，《詩集》八卷附《詞草》二卷。

板行世，世是以無聞焉。⁶³

他將各家經學的粲然成書，著於一代，對比於存與的不以經學自鳴，世無聞焉，使莊氏與考據學者之間形成強烈反差，為其批判考據，推許莊氏預留了空間。其次，他高度評價了存與之學，他說：

其為文，辯而精，醜而肆，旨遠而義近，舉大而不遺小，能言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巨擘也⁶⁴。

言下之意，蓋以為真正的經學，應是存與辯精醇肆、旨遠義近的文章體裁，而不是由《說文》、《爾雅》入手所考據訓釋的經學。最後，董氏強烈的批判乾隆年間所流行尊漢貶宋的考據之學，是門戶太深，是其術太峻，其說太拘，更可以視為是常州價值的展現，值得吾人注意，他說：

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醜深于漢經師之言，而無濶以游雜，其門人為之，莫不以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固其藝精，抑示術峻，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為空言而實學恣肆如是者哉！昔許慎、何休著書，鄭康成駁辯之，而《鄭志》文有與諸弟子互相問答之語，亦或病其術之太峻，而虞其說之太拘歟？⁶⁵

蓋董氏此文，實為研究常州學派重要的參考文獻，非共習莊氏之學，與莊氏子弟切磋研討者，不能至此。所以，他介紹的雖是莊存與的學問，然其自身亦未嘗沒有將常州之學與漢學考據家對立的意圖在內。吾人在討論綬甲交遊的同時，也正是在探尋常州學派開展的軌跡的同時，這一點是討論莊綬甲師友交誼時須格外注意者。

當然，在綬甲的交遊中，最值得注意的莫過李兆洛了。從古文辭的角度來看，李氏最引人注目者，是他所編纂的《駢體文鈔》，薛子衡在〈李養一先生行狀〉中提到李氏編輯之目的：

先生嘗病當世之治古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六經》以降，兩漢猶得其緒遺，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因輯斯編，至是遂序而刻之。……當世皆知，是編可以正駢體之軌轍，而先生實欲以是溯古文之原始也。⁶⁶

⁶³ [清]董士錫：〈易說序〉，[清]莊存與：《味經齋遺書》（光緒八年陽湖莊氏藏板），卷首，頁3a。

⁶⁴ 同前註，頁3b

⁶⁵ 同前註，頁3b-4a。

⁶⁶ [清]薛子衡：〈李養一先生行狀〉，《養一齋文集》，卷首，頁3a-4a。

在清中葉的駢散之爭中，陽湖文派以其融通駢散，講求學問文章兼擅的古文主張，展現其獨特的經世之志，這一點在李兆洛的身上最為鮮明⁶⁷。陸寶千先生認為：「陽湖派者，使經世性之文章文學化也。世人於桐城、陽湖之別，專從駢語之取舍着眼，固皮相焉。」⁶⁸今觀《駢體文鈔》上編所錄者「皆廟堂之製，奏進之篇」，中篇所錄則「指事述意之作」，而下篇所錄，「多緣情託興之作」⁶⁹，則其宗旨，蓋亦欲追尋古人寓學問於文章之軌跡，此薛子衡所謂「《六經》以降，兩漢猶得其緒遺，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也；而薛氏所言《駢體文鈔》欲以溯古文之原始者，也正是有古人寓學問於文章或文章即學問這一認識的緣故。進一步言之，李氏文章宗兩漢的主張，與莊氏學術之宗兩漢者，在精神上更是若合符節，因為在他們看來，能將學問與文章完美結合，並展現醇正義理者，非兩漢莫屬，尤其是大臣們的廟堂之製，奏進之篇；更何況莊氏學術根源，與其說是重在重現今文博士的章句之學，毋寧說是重在追述大臣的援經立義，出以策論奏議的經術文章。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李兆洛不但自己為《駢體文鈔》寫序⁷⁰，並且也請綬甲另作一序，在《養一齋文集》中且有〈答莊卿珊書〉，對綬甲有關《駢體文鈔》選文標準的疑問，提出澄清⁷¹。即此已可以見李兆洛與莊綬甲學術關係之密切。

不過，李兆洛對莊氏學術乃至常州學派最大的貢獻，乃在於他對莊氏家族學術行誼的記載以及對莊氏著作的整理與刊刻。筆者檢閱李氏文集，時可見其對莊氏家族學術行誼之敘述，原因很簡單，乃在於他掌握了莊氏家族的第一手資訊。在〈珍藝宦遺書序〉中，李氏云：「兆洛自交若士、申受兩君，獲知莊氏之學。……繼又得交宗伯之孫卿珊，得盡窺（存與、述祖）所著造，伏而讀，仰而思，累月日乃曉然有會于讀經之法與讀書之法。」⁷²李氏所以能在莊氏家族菁英殆盡之後，負起保存莊氏著作之責，在於他經丁履恆、劉逢祿的介紹，得知莊氏之學，又從綬甲處得盡窺存與、述祖著作，而大為嘆服之故。也由兆洛此文，讓我們了解到常州學派能為世所知，莊綬甲實功不可沒，他一反父祖秘不示人的態

⁶⁷ 詳細討論，請參曹虹：《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6章。

⁶⁸ 陸寶千：〈愛日草堂諸子——常州學派之萌坼〉，頁79。

⁶⁹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養一齋文集》，卷5，頁8b-9b。

⁷⁰ 同前註，頁7b-10a。

⁷¹ 李兆洛：〈答莊卿珊〉并附卿珊作〈駢體文鈔序〉，同前註，卷8，頁6a-8a。又：蔣彤撰李氏年譜，繫此事於道光元年。

⁷² 李兆洛：〈珍藝先生遺書序〉，同前註，卷3，頁18b-19a。又載《珍藝宦遺書》卷首。

度，將祖父、叔父的著作公開，讓莊家以外的人也能夠掌握到二人的學術精神。我們如果讀完李氏所撰〈南村制義序〉、〈尚書既見序〉、〈周官記序〉、〈莊珍藝先生傳〉、〈珍藝宦遺書序〉、〈拾遺補藝齋遺書序〉、〈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禮部劉君傳〉，以及蔣彤錄李氏晚年指示學問門徑的《暨陽答問》，再結合其弟子薛子衡、宋景昌分別撰寫的〈八卦觀象解跋〉，蔣彤的〈莊存與傳〉、〈書莊方耕先生春秋正辭後〉、〈書莊方耕先生四書說後〉、〈書劉申受先生公羊釋例後〉而觀之，則莊氏家族三代之生平行誼與學術大要，莊氏家族在常州的地位，以及莊氏學術在常州的意義，已大致可以掌握，而李兆洛師弟的敘述，對吾人理解莊氏乃至常州學派的重要性，已毋庸贅言。

尤有說者，莊氏文獻的保存與流傳，李兆洛可謂居功厥偉。因為莊氏一門著述，多賴李兆洛爲之整理刊刻。今觀蔣彤《李養一先生兆洛年譜》道光十八年條下所記：

鄉先哲莊宗伯存與諸經皆有撰述，多未刊行，孫卿珊受甲先以《尚書既見》、《周官記》二書示先生，一一爲訂正定其體例，既序而行之矣。與卿珊書曰：「《周官記》之書，非《尚書既見》比，宜詳核《周禮》，參互融會，爲之注釋，使至精之思，至實之理，一一發露，庶幾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然卿珊急於刻之，未暇事此也。繼示以《四書說》、《樂說》，先生復書曰：「樂律向曾學之。所說與宋、明人多差異，而理解精微，遠過昔人，無奈不聰於耳，又不諳於簫管，故未能究極妙處。嘗欲覓一善吹笛者，與之細辨笛色工尺，則此處亦無不可了，而竟不得暇，此後當留心爲此，稍解七律，然後合之於書，庶幾不致茫然。」再後卿珊子子定潤示以《象傳論》、《象象論》、《繫辭傳論》、《八卦觀象解》、《卦氣論》諸種，并《算法約言》，先生常自攜尋繹，歎其精微廣大，心胸常若不能容受。又曰：「此身通六藝，七十子之徒也。」遂次第付刊。《算法約言》未成之書，付冕之徐竟其緒。并前卿珊所刻《尚書既見》、《尚書說》、《毛詩說》、《周官記》、《春秋正辭》七種，合并行世而不爲序，曰：「吾於莊宗伯不能測其涯也。」傳宗伯之學者，從子珍藝先生述祖，外孫劉申受逢祿。申受書皆行世，珍藝書多至百卷，其子文灝不能盡刊，多刻序例，使學者可尋繹。先生并命子定刻卿珊遺書，使莊氏之學，天下得觀其大全云。按珍藝有《說文古籀疏證》，先生每歎爲奇書，賞其精而嫌其鑿，嘗命聖俞錄存副本，就其義例，重加訂定，發其凡以示聖俞，然不能竟業，屢

書督珍藝子墀奠又朔，墀奠固深於《說文》者，亦不及成也。⁷³

在這則文獻中，蔣彤提到綬甲最早出示的是《尚書既見》、《周官記》二書，李兆洛除一一訂正其體例，爲之作序之外⁷⁴，更建議綬甲應慎重處理《周官記》一書，使能行之久遠；另外，兆洛對《四書說》、《樂說》的評價是理解精微，遠過昔人，可惜他自己對樂律等專門之學所知不多，無法提供建設性的見解；在綬甲身故之後，其哲嗣莊潤子定再出示《象傳論》、《象象論》、《繫辭傳論》、《八卦觀象解》、《卦氣論》及《算法約言》，李氏歎其精微廣大，目存與爲身通六藝，七十子之徒，故可刊者刻之，未竟者責成學生董理之。今觀薛子衡〈八卦觀象解跋〉云：「先生（存與）經說多已刊布，是書則今歲吾師申耆先生始刊行之。余又得先生之孫經饒先生寫本校正焉。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八月，同邑後學薛子衡謹跋。」⁷⁵又宋景昌〈八卦觀象解跋〉云：「方耕先生遺書大半多已刊行，是書則吾師申耆先生今歲校刊也。剞劂既就，以景昌習于天官家言，命疏其所以，故述其略例如右，道光戊戌季秋月朔江陰後學宋景昌謹跋。」⁷⁶文獻顯示，綬甲刊刻存與遺著此一未竟之業，乃由李氏續成之，並使其合并行世。另外，傳存與之學者，述祖、逢祿著作既已行世⁷⁷，兆洛乃又助莊潤刻綬甲遺著，務使莊氏之學，

⁷³ 蔣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80-183。

⁷⁴ 按：今存李氏文集中載有〈尚書既見序〉、〈周官記序〉，既推崇存與能得聖人之旨，並諷刺樸學之士的佔嚙記誦乃迂僻膠固，不知治經在於會通以致用，讀者可覆按。

⁷⁵ 薛子衡：〈八卦觀象解跋〉，見（清）莊存與：《八卦觀象解》（光緒八年陽湖莊氏藏板），卷末，頁3a-b。

⁷⁶ [清]宋景昌：〈八卦觀象解跋〉，見同前註，頁5b。

⁷⁷ 按：述祖主要著作，亦在道光年間，陸續由其子又朔刊行，爲眷令坊刊本，然既有因卷帙龐大，留遺珠之憾者，如《校逸周書》十卷、《毛詩授讀》三十卷；亦有草創未就，僅刻序例者，如《說文古籀疏證》。至於逢祿生前，其《春秋》著作即有刊行之議。據李氏《年譜》所載，早在道光四年（甲申，1824），兆洛即在暨陽書院校刊逢祿之《公羊釋例》，初刻於邗上（揚州），未成，復取以歸爲補刊之，並移書京都，索其別種，以《公羊》未得其深而未爲作序。另據劉承寬〈先府君行述〉云：「（逢祿）凡爲《春秋》之書十有一種。宮保阮公、申耆李公，各爲梓行于廣東、揚州。」孫海波則云：「今按劉氏遺書，其說經之作，多刊入《皇清經解》中，文集則有家刻本，《春秋》之書，則有太清樓、養一齋兩本，即〈行狀〉所謂宮保阮公、申耆李公，各爲梓行于廣東、揚州者也。惟劉氏說《春秋》之書，稿前後數易，故養一齋所刻，與經解不同，而《易虞氏五述》，世多未見，惟養一齋刻本《何氏釋例》卷後附有《虞氏易》殘帙數紙，即所謂《五述》者也。」孫氏除詳細比對逢祿遺著之刻本及內容異同外，並言及養一齋本之《禘議》及《易虞氏五述》，本爲《皇清經解》所收書，並已雕板，後恐以此二書統貫難尋之故被擯。及李申耆爲逢祿刻遺書時，不忍聽其湮沒，遂就已雕之板，別鑄養一齋之名而彙行之，故其版式一如經解之舊也。蔣彤：《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卷2，頁21；劉承寬：

天下得睹其大全。今觀李氏〈拾遺補藝齋遺書序〉云：

吾友卿珊莊君，……歿十一年而君之子潤，盡奉其所著遺稿乞余爲理而刊之，其書之粗就者曰《尚書考異》、曰《釋書名》二種而已，餘皆首尾不能完具，所爲古文幾百篇，亦叢殘不成篇帙，稍稍詮次而成是編。……此編區區，何足以盡君之學，亦何足以見君之志致所謂宏且遠者？而不能不藉是以傳君也，可哀也哉！吾黨少俊而夭折者多，有如江安甫、金朗甫，皋文先生俱爲刻其未成之書，以傳其學。然安甫、朗甫年才弱冠，而卿珊已逾強仕，不可謂無年，徒以奔走衣食，日月耗於道途，自恃壯盛，欲得衣食足而後畢力於此，此日足可惜，安能待來茲？此則不能不爲君深憾者也。……道光戊戌李兆洛撰。⁷⁸

李氏行文，讓人感受到他對莊綬甲的真摯情感，從綬甲刻存與遺著時提供建議，到襄助莊氏遺族整理家族文獻，到爲莊氏家族撰寫傳、狀、書序，到晚年指示學術門徑時仍盛推莊氏之學，讓人感受到李氏對莊氏家族，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崇敬⁷⁹，這與他對莊氏之學的深度理解有密切關聯，故李兆洛實爲常州學派之功臣，亦爲常州價值之維護者。

另外，道光戊戌即道光十八年，綬甲《拾遺補藝齋遺書》爲道光十八年刻本，而薛子衡、宋景昌序存與《八卦觀象解》，亦言李氏校刻存與遺書，在道光十八年。由是而知綬甲所研精校讎存與遺著而未及刊刻者，由兆洛續成之，併綬甲遺書亦刊行其後也。再來看王大隆的〈釋書名跋〉，王氏云：

右《釋書名》一卷，清莊綬甲撰。案綬甲……客遊早世，撰述多未成，沒後，子潤整理遺稿，寫成《尚書攷異》及此書，爲《拾遺補藝齋遺書》。道光戊戌（十八年，1838），李兆洛序而刊之，傳布未廣，板遭兵燹，後其孫寶森訪得一本，欲重梓而未果。光緒十五年，寶森猶子謙吉始以此書付活字排印，而《尚書攷異》卒未得見，今活字本亦希流傳，蓋其傳之之難如

〈先府君行述〉，卷11 附錄，頁5b；孫海波：〈書劉禮部遺書後〉，周康燮主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香港：存粹學社，1978年），頁336-337。

⁷⁸ 李兆洛：〈拾遺補藝齋遺書序〉。按《養一齋文集》本〈拾遺補藝齋遺書序〉不著撰作年月，然附於《拾遺補藝齋遺書》卷首的李氏之〈序〉，文末則有「道光戊戌李兆洛撰」諸字。

⁷⁹ 又：《年譜》道光十九年九月下載：「（李兆洛）赴龍城書院，院西爲先賢祠，祀季子而下六十有八人，先生率弟子輩瞻拜，惻然曰：『前人創此基業，後人豈忍廢之？亟宜與守令議，且補入莊宗伯、張皋文二人。』」又曰：『昭明太子爲吾常文學之祖，豈可缺而不祀？』然竟不及舉也。」蔣彤：《清李中耆先生兆洛年譜》，頁190-191。

此，瑞安張君宋廡寄示所藏舊鈔本，……付諸手民，深惜《尚書攷異》已佚，不得與此並傳也。歲丙子冬月吳縣王大隆跋。⁸⁰

王氏此文，大略介紹了《釋書名》之流傳始末。蓋李氏所刊布之《拾遺補藝齋遺書》，幾毀於兵燹，後雖經綬甲文孫訪得《釋書名》一部，然《尚書考異》已不得見。由王氏跋語觀之，知其深惜《尚書考異》已佚，不得與《釋書名》並傳於世，實則《拾遺補藝齋遺書》至今尚存海內孤本於北京圖書館，其內容亦不止《尚書考異》與《釋書名》而已（詳下）。

當然，與綬甲朝夕研討，無間術業者，除了上述諸子外，還有他的兩個表弟劉逢祿與宋翔鳳。在逢祿的詩集中，留有許多他與丁履恆、張惠言、李兆洛、莊綬甲、宋翔鳳等人交往的記載⁸¹。值得注意的是，逢祿有〈五經考異序〉一文，記其有感於司馬文正公之言，凡讀書必先審其音、正其字、辨其句讀，然後可以求其義。欲先校夫子所正《五經》，乃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采輯舊本經籍所引，旁稽近代名儒深通經義小學者之言，彙為一編，以為童蒙養正之始基，然奪於他務，未暇為之。至嘉慶十四年（己巳，1809）冬天，乃與同里學者臧庸、莊綬甲，分經掇拾，而自己則擔任《易》與《春秋》之彙校。其後臧庸《詩考》幾成而逝，綬甲為《尚書考》將半而中輟，《禮考》則為逢祿與弟子潘準共同擔任，乃稿本哀然，惜潘準不幸夭折，稿藏潘氏遺篋亦杳不可得。至嘉慶十七年（壬申，1812）夏日，薛傳均之弟子張潤欲將其舊輯《易》與《春秋》之稿付諸梓

⁸⁰ 王大隆：〈釋書名跋〉，見莊綬甲：《釋書名》，收入（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叢書集成續編》，第18冊影印《丁丑叢編》本）13b-14a。

⁸¹ 如在〈歲莫懷人詩小序〉中，逢祿云：「精研《易》、《禮》，時雨潤物，吾不如張皋文。」又云：「博綜今古，若無若虛，吾不如李申者。」其〈歲莫懷人雜詩十六章〉之五有「仙人號若士，聳聲出雲表，抗論邁三古，秦漢一何小」之語；之八則有「茗柯絕世材，假年志不就」、「申者亦博綜，一麾用差謬」之語；之十二則云：「吾鄉大儒宗，好古竟忘耄，味經善識大，味經，外王父齋名。珍藝益精眇。珍藝，從母舅葆琛先生齋名。……廿年正《夏時》，絕學三代表，晚歲窮古籍，匡許到秋杪。……從游綬與鳳，綬，莊卿珊；鳳，宋于亭。敏魯各深造。著作滿一家，竹帛永持保。」又其〈寄李四申者〉有「要將經緯作元化，豈僅文章動帝闕，回首昔年觴咏地，一簾花月夢初還」之句，既表達對兆洛經術文章的推崇，也表現對往日交遊的懷念。另外，劉承寬所述逢祿交遊，已見於前，而陸繼輅〈先太孺人年譜〉亦載：「〔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五十九歲，是年不孝補陽湖縣學生員，同案莊綬甲卿珊、劉逢祿申甫尤嗜學，來謁太孺人，太孺人一見，許為益友，命不孝勤相過從。」劉逢祿：〈歲莫懷人詩小序〉、〈歲莫懷人雜詩十六章〉、〈寄李四申者〉，《劉禮部集》，卷10，頁2a、卷11，頁12b-14a、20b；〔清〕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497冊影印清嘉慶二十五年合肥學舍刻本），卷20，頁10b。

人，以為續考群經者倡。逢祿嘉其意，不以未定而阻之。並言《詩考》可以校定，而《書考》則促綬甲成之，至於《禮經考》，只能祈其不至人琴俱亡了⁸²。今張潤手鈔以付梓人之《周易考異》、《春秋考異》皆未見，而逢祿與弟子潘準合纂之《禮古經考異》亦杳然無蹤，惟綬甲遺著有《尚書考異》三卷，乃當年逢祿所倡《五經考異》之一部分。今觀綬甲〈尚書考異敘目〉云：

囊同姑子劉申受庶常討論《五經》，病其文多譌舛，始約共纂考異，定所適從。申受盡得外氏之傳，于先宗伯《公羊春秋》之學尤精，而專分得《易》、《春秋》；綬甲分得《詩》、《書》；適潘生準來就學《禮》，爰以《禮》屬之。而先為《尚書》，采集同異，稽譌其說，殆三歲而略備。⁸³

依筆者初步觀察，當時針對經典及古籍的校勘異文，彙聚同異，業已蔚為風氣。單是常州就有不少學者從事這項工作，例如莊述祖校勘經典之作，即有《尚書古今文考證》、《校尚書大傳》、《校逸周書》、《毛詩考證》、《穀梁考異》、《五經小學述》、《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校正白虎通別錄》、《校定孔子世家》等，述祖在〈校薛氏詩古文訓古文序〉中云：「述祖欲以古文籀篆參校《五經》。」⁸⁴今觀其《尚書古今文考證》、《毛詩考證》，乃從分別今、古文字入手，參以今、古文經學家法校勘異文；其《穀梁考異》、《尚書大傳》、《逸周書》、《孔子世家》等校本今雖未見，所用方法當亦雷同。又如孫星衍，著名的《平津館叢書》與《岱南閣叢書》所載，大部分是他利用校勘之學所整理重刊的古籍。又如臧庸，臧氏一生的學術工作真可用「校勘異文，彙聚同異」概括之⁸⁵。即使對校勘之學「意殊不屑」⁸⁶的李兆洛，亦是與顧廣圻、劉逢祿、莊綬甲等好友覃精經

⁸² 劉逢祿：〈五經考異序〉，《劉禮部集》，卷9，頁7a-b。

⁸³ 莊綬甲：〈尚書考異敘目〉，《尚書考異》（道光十八年刊本），卷首。事實上，綬甲曾企圖將對《五經》異文的考釋擴大到《十三經》，並參照逢祿援引陸氏《釋文》之例為之，惜其中道齋志。今觀劉承寬所云：「（逢祿）又嘗欲為《五經攷異》，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以存異文古訓，先成《易》一卷，《春秋》一卷。」又李兆洛云：「囊吾友莊卿山欲成《十三經異文》一書，本之《釋文》，旁諏諸家，斷自唐以上，形聲之異皆備著之，惜其中道齋志。」劉承寬：〈先府君行述〉，卷11附錄，頁6b；李兆洛：〈錢子樂十三經斷句序〉，《養一齋文集》，卷3，頁15a。

⁸⁴ [清]莊述祖：〈校薛氏詩古文訓古文序〉，《珍藝室文鈔》（道光間莊氏春令坊刊本），卷5，頁16a。

⁸⁵ 拙作：〈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以臧庸與李兆洛為討論中心〉，頁263-303。

⁸⁶ 蔣彤：《清李中耆先生兆洛年譜》，頁10。

術，校正古書⁸⁷。至於宋翔鳳《過庭錄》卷二、三之《周易考異》，是否亦為逢祿所倡《五經考異》的成果之一，抑或為繼逢祿未竟之志，則已無從考證矣。不過從翔鳳的《管子識誤》中，吾人當可推知常州學者已接受並利用校勘之學此一當時學術界的共同語言，作為與考據主流對話的工具之一。今觀其跋語曰：

明刻《管子》，以劉績本為近古，有意改處，皆明言之。其後有趙用賢本，稍遜。嘉慶壬申歲，客南昌，就郡守張古餘丈借得影抄南宋初年本，對校一過，絕多勝處。王石渠、孫伯淵諸先生所據之宋本，皆從此本，校於今所行本，不能無遺漏。儻有力者借影抄本重雕，則盛事也。嘗見石渠先生校《管子》既精博，歲甲申，至廣州，頗與同歲生臨海洪君論《管子》，而余時出異同，遂錄所見為《管子識誤》，冀附王、洪兩家之後，以質好古君子。⁸⁸

筆者認為，這一則記錄，既可以看作是考據學風潮對常州學者造成的影響，也可以視作是常州學者企圖與考據學主流對話的文獻。跨出常州，則校勘經典的風氣又更加盛行。誠如梁啟超(1873-1929)所云：「校勘之學為清儒所特擅。」⁸⁹清儒治學既重視古典的鑽研，又以學風嚴謹相自許，乃逐漸養成讀書講究善本，治學重視經籍校勘的風氣。龔自珍曾言：

李銳、陳奐、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龔自珍歲為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莊綬甲。⁹⁰

這是一則頗有價值的記載。寫定《五經》，應在經典校勘之學成熟後方有可能，在這之前，諸經勢要經過一番分別古今文字乃至分別經學家法的洗禮，而這種情形，常見於江聲、王鳴盛、孫星衍、段玉裁、莊述祖、臧庸、莊綬甲、宋翔鳳等人的著作中，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治學方法上，常州學派第三代成員與漢學家已無太大出入，從莊綬甲、劉逢祿、宋翔鳳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此一治學痕跡，

⁸⁷ 黃體芳：〈養一詩集序〉，卷首，頁1b。

⁸⁸ 宋翔鳳：〈管子識誤跋〉，《過庭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45。

⁸⁹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頁224-225。

⁹⁰ 龔自珍：〈古史鈞沈論三〉，《龔定庵全集類編》，卷5，頁104-105。

而龔氏此條記載，也就更有學術史的價值。

當然，綬甲與逢祿的關係，仍有可說者。嘉慶二十二年（丁丑，1817），逢祿由庶吉士改官禮部，結識其父高弟歷城尹濟源，自尹氏處獲得八十年前外祖莊存與甲子科中舉之墨卷，嘆其手澤猶新，而惜不能盡得存與鄉會試三場硃墨之本，以存與於諸孫中尤愛綬甲，故謹記此事始末，歸此卷於內兄綬甲。並言綬甲生於甲午（乾隆三十九年，1774），長予二歲，至相得也⁹¹。嘉慶二十五年（庚辰，1820），阮元於廣東建學海堂，欲蒐採當代說經之書，以為後學津逮，逢祿乃從綬甲處錄寄存與遺書付之⁹²。另外，綬甲、逢祿文集中雖未見書信往來，然兩人的學術交流，仍可從逢祿著作中窺見一二，例如在《尚書今古文集解》中，逢祿於〈皋陶謨第二〉「侯以明之」以下八句加案語曰：「莊綬甲疑王肅等羈入，不為無見。」⁹³又其〈甘石星經正誣〉載綬甲問「急繕其怒義」，逢祿據唐僧一行所據古義以答之⁹⁴。

綬甲、逢祿之交誼已略如上所述。至於翔鳳，李兆洛〈洞簫樓詩紀序〉說：「余於嘉慶己未（四年，1799）識于庭於莊卿山家。」⁹⁵翔鳳則提到，他在嘉慶四年，隨母歸寧，母命留常州，舅父莊述祖教以讀書稽古之道，家法緒論得聞其略⁹⁶。從這兩則記載中，可據以略推當年諸子的交游情景。翔鳳對綬甲頗有依戀之情，其詩文集中時可見到綬甲的相關記載，除了之前所引〈常州懷莊四綬甲劉六逢祿兩外兄〉及〈秋日懷人詩·莊卿山外兄〉二詩之外⁹⁷，如題〈舟過常州趙味辛先生招同陸祈生繼輅莊卿山綬甲讌集齋中見秦中留別四詩即次原韻奉呈〉，中有句謂「耆舊頻驚異物遷，常州老宿如迂甫舅氏、趙甌北、洪北江諸先生相繼謝世。靈光猶見兩名賢，謂傑琛舅氏暨味辛先生。著書各積一千卷，名世都逢五百年。」⁹⁸此詩蓋趙懷玉招集陸繼輅、莊綬甲、宋翔鳳等人的讌集之作，是年為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又如題〈途次理近日所得書間各繫一詩〉之四，其云：

⁹¹ 劉逢祿：〈記外王父莊宗伯公甲子次場墨卷後〉，卷10，頁8a-9a。

⁹² 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味經齋遺書》，卷首，1b。

⁹³ 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臺北：復興書局，1972年《皇清經解續編》，第6冊），卷2，頁11a。

⁹⁴ 劉逢祿：〈甘石星經正誣〉，《劉禮部集》，卷8，頁21a。

⁹⁵ 李兆洛：〈洞簫樓詩紀序〉，《洞簫樓詩紀》，卷首，頁1b。

⁹⁶ 宋翔鳳：〈莊珍藝先生行狀〉，卷3，頁16b。

⁹⁷ 按：其一繫年於嘉慶九年（甲子，1804），其一繫年於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

⁹⁸ 宋翔鳳：〈舟過常州趙味辛先生招同陸祈生繼輅莊卿山綬甲讌集齋中見秦中留別四詩即次原韻奉呈〉，《憶山堂詩錄》，卷8，頁4a。

莊子五十餘，面目殊未老，相別忽半年，使我形坐槁，
念子滯故山，常積經世抱，皜皜守家學，矻矻坐編校，
思悞正自適，俗塵定如埽，悠然憶朋儔，怒焉憂心搆，
纏繇書中意，相慰在遠道，須知四方人，乞食長不飽。

莊卿山外兄書自常州寄來。⁹⁹

此詩對綬甲既有傳神的描寫，也有自少至老不曾磨滅的情誼。「念子滯故山，常積經世抱」，既表達了綬甲具有常州學者共同之精神，也點出了常州學者「不遇」的淒涼；「皜皜守家學，矻矻坐編校」，描寫的是綬甲對莊氏家學的繼承與整理；「須知四方人，乞食長不飽」，既是自況，也是相憐。詩繫於道光四年（甲申，1824），距綬甲亡故僅四年，故曰「莊子五十餘」。又詩中所言思悞者，即劉逢祿，思悞為其書齋名，現行流傳由龔自珍、魏源、陳潮、凌堃等人整理之《劉禮部集》，即道光十年思悞齋刊本。另外，翔鳳題〈飲席贈丁叔侯煦若士履恆莊卿山綬甲吳子山育董晉卿士錫趙芸酉申嘉吳碩甫特徵〉¹⁰⁰，有「每思知己在江湖，獨向長干贈楊柳」之句，表達的仍是對友朋遊食四方的同情，詩繫於道光五年（乙酉，1825），至道光九年（己丑，1829），逢祿謝世，宋翔鳳則有〈哭外兄劉申甫禮部逢祿二首〉，詩云：

絕學群言寄此身，著書一室邈無鄰；早衰記語同心友，將沒誰為枕衾人。
惜我未歸秋病葉，哭君臨去路荒榛；壁中科斗航頭策，漠漠愁隨萬古塵。
久甘巖谷任蘊藏，每聽容臺議禮詳；一歲長余同寂寞，千秋待子忽淪亡。
文遲誅德愁難理，哲嗣屬余為誄文，尚未脫稿。世便需才事已荒；記失蒙莊偕雪涕，
獨絨餘恨過江鄉。去臘莊卿山外兄物于常州，正月抵京，與君同聞此耗。¹⁰¹

開頭四句傳神描繪出逢祿獨學無友，寂寞不為世人理解，乃至抱負難酬而學問又終將無傳的窘境。的確，「壁中科斗航頭策」，指的是從述祖所受的《說文》古籀之學以及家族幾代相傳，具有特殊解釋的《尚書》之學，在綬甲、逢祿相繼謝世之後，此絕學殆亦同埋地下，永為萬古塵埃。蓋綬甲卒於道光八年冬，九年正月逢祿與翔鳳在京同聞此耗，而逢祿旋亦謝世，故有「記失蒙莊偕雪涕」之語。又翔鳳〈李申耆兆洛屬題同車圖寫友人及弟子十餘人同坐一車中〉有云：「當年懷遠道，

⁹⁹ 宋翔鳳：〈途次理近日所得書間各繫一詩〉之四，《洞簫樓詩紀》，卷4，頁6b。

¹⁰⁰ 宋翔鳳：〈飲席贈丁叔侯煦若士履恆莊卿山綬甲吳子山育董晉卿士錫趙芸酉申嘉吳碩甫特徵〉，同前註，卷8，頁5a-b。

¹⁰¹ 宋翔鳳：〈哭外兄劉申甫禮部逢祿二首〉，同前註，卷13，頁8b。

此日有先民。圖中如祝子常、莊卿山皆謝世。」¹⁰²是詩繫年於道光十年（庚寅，1830）。至其〈題周素夫世錦紀遊圖冊三十首〉，其中一詩乃是對其常州交游的總回憶，詩云：

南蘭陵多老尊宿，人痛山阿存著錄。張皋聞先生最先沒，後則先舅氏迂甫、葆琛兩先生及洪稚存、孫淵如、趙味辛諸先生相繼下世。後來交舊亦凋殘，莊傳永早沒，其後如洪孟慈、劉申甫、李中耆、陸祁孫、莊卿山、陸劭聞、丁若士、管孝逸並殂謝。偶作相逢猶落落。¹⁰³

是詩繫於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其時常州著名學者，不管是長一輩的張惠言、莊通敏、莊述祖、洪亮吉、孫星衍、趙懷玉，還是同輩的莊傳永、洪孟慈、劉逢祿、李兆洛、莊綬甲、丁履恆、陸繼輅、陸劭聞、管蓬萊，蓋已零落淨盡，翔鳳以其高壽，只能每憶故人，獨享寂寞。以上所列，為宋翔鳳從嘉慶四年至道光二十五年的四十六年間，對莊綬甲以及常州同人的敘述或回憶，足以見翔鳳、綬甲之交情，亦可以推常州學者交流之密切。是知論常州之學術經說，當能於異中求其同，同中見其異。異中求其同者，求其經世之共同精神；同中見其異者，則是此一經世理念落實在文化、學術、文學、政治各層面的具體情況，尙有待進一步梳理。至於逢祿、翔鳳與綬甲學術淵源關係，則留待綬甲學術之部一併討論。

三、綬甲對家學的整理與傳承

在考據學方法引進之前，「經術文章」是常州學派表現學問的基本觀念，「文章」便於科舉發揮，「經術」則由文章表現，二者互為體用，既利於科舉，亦便於闡釋經義¹⁰⁴。從莊存與、莊逢原的著作每以表現義理的「論」、「說」、「解」

¹⁰² 宋翔鳳：〈李中耆兆洛屬題同車圖寫友人及弟子十餘人同坐一車中〉，同前註，卷14，頁1b。

¹⁰³ 宋翔鳳：〈題周素夫世錦紀遊圖冊三十首·毗陵菊齋〉，同前註，卷20，頁16b-17a。

¹⁰⁴ 按：程勇在討論漢代儒家的經學文論時，提出經學與經術分野的問題，他認為儒家的文化立場，從先秦到兩漢，歷經了「從民間文化立場」到「體制文化立場」的轉變，由於時代發展與思想立場的變化，造成兩漢視野中有「經學」與「經術」之別。「學」的具體目的在於「通經」，「術」的目的在於「致用」。「經學」指向儒家經典一般精神與意義，其中包含了個人修養與人格精神，而與知識分子的民間文化立場相對應。而「經術」則指向了實際政治實踐，具有直接的統治教化的功利目的。筆者認為，「民間文化立場」與「體制文化立場」的對立之說尚待仔細分疏，但常州學者所重之漢學，確實是偏於程

命名，即可看出端倪。當然這種說經方式，隨著考據學方法的引進而逐漸被取代，居於關鍵位置的莊述祖，其著作即可看到既保有文章特色，也出以考據語言的過渡情形¹⁰⁵，到了莊綬甲、劉逢祿、宋翔鳳，其經說就純以考據形式表現了。這一現象，顯示的是家族所奉行的經術文章合一之路，在考據學思潮的沖擊之下，已難以成為表現學問或與學術界「對話」的理想形式。當然，研究常州學派，學問表現形式的變化雖是重點，不過學派特殊的經說以及幾代學者之間的累積性研究，更值得吾人關注。舉逢原、綬甲父子為例，據莊貴甲〈先考匯川府君行述〉所載，其父莊逢原：

好學老而彌篤，手錄大父（存與）經義數十卷，終日探索，雖甚寒暑不輟。前歲病瘍，臥床猶撰《周易訓解》，皆扶力手書，旋作旋改，不憚再三，蓋性所嗜也。說經不設漢、宋儒見，各取其言之當者而會通之，一以經文為質。著有《易說》、《春秋說》、《詩鄭箋正謬》，于天人性命鬼神之說並各有論著。¹⁰⁶

身為存與長子，莊逢原可以說是繼承發揮存與之學的最適當之人，惜其學業不就，困於場屋，為吏於窮鄉僻壤之間。晚年居家時方重拾存與之學，手錄亡父經義數十卷，終日探索。其所發揮，亦不外是存與所揭聖王天道之學，故曰于天人性命鬼神之說並各有論著。惟其著作於今，蓋已不存於天壤之間矣。至於綬甲，則如李兆洛所云：

自國朝以來，莊氏為邑右族，觀察公（莊柱）以名德矜式鄉里，宗伯公兄弟（莊存與、莊培因）相繼大魁，子孫仍世，科名鼎盛。君兄弟三人（貴甲、綬甲、褒甲），從兄弟復若干人，皆能守其家學，粲粲彬彬，望之者若王謝子弟，別見標格。而君尤力學，得師法，好深湛之思。宗伯公經術淵茂，諸經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別漢宋，必融通聖奧，歸諸至當；而君從父珍藝先生（莊述祖）盡傳其業，復旁究《夏小正》、《逸周書》，暨

勇所說的「經術」一面，此即筆者所謂「莊氏學術根源，與其說是重在重現今文博士的章句之學，毋寧說是重在追述大臣的援經立義，出以策論奏議的經術文章」之意。故其目的乃為參與政權，其工具則為策論文章。程勇：《漢代經學文論敘述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頁64-81。

¹⁰⁵ 莊綬甲〈尚書攷異敘目〉云：「蓋先宗伯始嘗〈書序〉之旨，貴玩經文以解經；從祖父代傳樸學之科，能識古文以證古。」點出了存與、述祖學術表現型態的不同。（《尚書攷異》，卷首，頁1b）

¹⁰⁶ 莊貴甲等撰：〈先考匯川府君行述〉，卷20，頁9b。

古文篆籀之學，皆一代絕業也。訓導公（莊逢原）宿稟庭聞，因源導委，綴次遺學，所著盈篋而年壽未究，九仞猶虧。君既負敏達之資，思兼綜素業，通滙條流。¹⁰⁷

李兆洛除了提到綬甲良好的出身及好學深思之外，文中更提示了莊氏家學三代之間的傳承關係。經術淵茂，深造自得的莊存與，其學傳於逢原、通敏¹⁰⁸、述祖等人。述祖不但盡傳存與之業，復能推而旁及《夏小正》、《逸周書》，暨古文篆籀之學；而逢原則主要是發揮存與遺說，並整理存與遺著。身為第三代的莊綬甲，則是思兼綜素業，通滙條流。他不但肩負起傳承祖、父、叔父學說的責任，也致力於整理刊刻祖父的遺著。所以，綬甲在莊氏家學傳承中的地位，由李氏此文，即可推知。甚至可以說，與劉逢祿、宋翔鳳相較，綬甲所傳承之莊氏家學，可謂最純粹者。在〈行狀〉裏，李兆洛對綬甲和堂兄弟們的競爽學藝，印象深刻。他說：「君伯兄吾珍貴甲、季弟頌平褒甲、從弟觀喻濤，少同師，長同尚，斐斐競爽，兆洛每過君齋，共諸昆季談學藝，未嘗不心悅。」¹⁰⁹不過他也說：「君尤力學，得師法，好深湛之思。」¹¹⁰可見綬甲是莊氏家族第三代成員裏，表現最爲突出者，所以也最爲存與及述祖所賞識。逢祿曾提到：「公（存與）于諸孫中，尤愛綬甲。」¹¹¹又翔鳳〈莊珍藝先生行狀〉在介紹述祖《夏小正》、古文篆籀之學後，接著說：「時從兄子綬甲，日從講論，得之最詳。」¹¹²另外，在〈拾遺補藝齋遺書序〉裏，李兆洛也提到：

憶與卿珊聚首時，每抗論當世績學之士，述造所得，其致功之門徑，詣力之深淺，銖分而寸計之，莫不洞其得失，纚纚有條理，以爲將來當集其大成，爲本朝一代粹學之薈，尤爲珍藝先生所愛重，凡所著述，常與上下其

¹⁰⁷ 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卷14，頁40a-b。

¹⁰⁸ 陸繼輅云：「莊迂甫表兄通敏，少宗伯方耕先生仲子也，好宣德香爐，官翰詹垂二十年，和坤浸用事，君飲大醉，即呼名痛詆，盡取所蓄爐，摔之滿庭，醒而惜之，則又購買，月或一二次，有賣爐者知其然，至移寓近之。君研精經學，而不好造述，歿後，予題其靈次云：『上相憚風裁，罵座如披彈，佞疏遺經究終始，杜門偏諱著書名。』」由此條記載觀之，則莊氏第二代皆傳存與之學，惟未必皆有著述行世。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157冊影印清光緒四年興國州署刻本），卷1，頁1a-b「莊中允爐」條。

¹⁰⁹ 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卷14，頁41a。

¹¹⁰ 同前註，頁40a。

¹¹¹ 劉逢祿：〈記外王父莊宗伯公甲子次場墨卷後〉，卷10，頁8b。

¹¹² 宋翔鳳：〈莊珍藝先生行狀〉，卷3，頁17a-b。

議論而資其飲焉。¹¹³

李慈銘曾云：「常州即以莊氏一家論，方耕侍郎啓之，葆琛先生繼之，而侍郎有孫曰綬甲，先生有子曰又朔，皆有讓述，而綬甲尤有名。」¹¹⁴ 這是常州以外學者對綬甲的印象。大概綬甲在兄弟輩中，是對學術最具熱誠者，所以能得述祖之愛重。李兆洛的另一條敘述，當可以加強這方面的印象。他說：

君子師友誼甚篤，若士，君姐壻也，君少從問業，終身執弟子禮甚恭，申受、于廷、晉卿（董士錫）皆親串，並年小於君，然每折衷經義，問所疑否，欲然請益，一義之勝，懽欣怡愉，奉之若師，意所不可，侃侃辨諍，不肯少挫。¹¹⁵

綬甲不但能對當世績學之士的述造所得，其致功之門徑、詣力之深淺，銖分寸計，洞其得失，並且對學問的熱誠，使他不但能與述祖討論深奧的古籀之學，並且對劉逢祿、宋翔鳳、董士錫等人也是欲然請益，不計己身較諸子年長，載在逢祿遺集，前已述之。述祖也寄望他將來能集其大成，為一代粹學之薈。所以，以綬甲所具有的這些特性來看，他的致力於繼承莊氏一門學問，也就理所當然。他對家學的貢獻，首先即在於整理並刊布存與遺書。李兆洛云：「方耕先生遺書皆未刻，君始為次第刊之，僅成一、二種而君死矣。」¹¹⁶ 又云：

宗伯公所著諸書多未刊布，君研精校尋，於未刻者次第付梓，已刻者補續未備，每一書竟，即探求旨趣，附記簡末，條理秩然可觀。惜乎僅竟三書而遽屬疾不起也。……卒之前一日，兆洛就榻前，見君不能臥，隱几對語，尚惓惓於宗伯公諸書，病起當悉力校刊。嗚呼！其志足悲也已。¹¹⁷

董士錫云：「道光八年（戊子，1828），其孫綬甲刻所著《易說》若干卷成，以示，余再三讀之。」¹¹⁸ 董氏此文繫年月於道光八年十月十日，正是綬甲去世前夕¹¹⁹，其時存與《易說》初刻成。綬甲另外刻成者，為《春秋正辭》，今上海古籍

¹¹³ 李兆洛：〈拾遺補藝齋遺書序〉，卷3，頁8b-9a。另外，李氏在綬甲的行狀裏也提到：「珍藝先生於諸子行尤器識君，有所得輒相披示，君亦能以穎悟之思出所見相飲益。」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卷14，頁41a。

¹¹⁴ 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頁821。

¹¹⁵ 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卷14，頁41a-b。

¹¹⁶ 李兆洛：〈拾遺補藝齋遺書序〉，卷3，頁9a。

¹¹⁷ 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卷14，頁40b-42a。

¹¹⁸ 董士錫：〈易說序〉，《味經齋遺書》，卷首，頁3a。

¹¹⁹ 按：綬甲卒於道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距董氏之作序，不過二月有奇。想見其卒前一日，尚惓惓於存與諸書，冀望病起後再悉力校刊，覽之而悲其志也。

出版社新纂《續修四庫全書》所收之《春秋正辭》，即道光七年綬甲所刻之本。《周官記》、《周官說》及《周官說補》，則已校勘完畢，或刊刻未及殺青而綬甲已卒。

除刊刻存與遺著之外，綬甲亦欲整理述祖的遺著，續其未成者。李兆洛云：「(述祖)所著書三十七種，若干卷，惟《夏小正》已具，《甲乙篇》未竟，而條理粗備，俟有志者成之，餘皆啓其端緒，引而申之者，存乎其人焉。」¹²⁰存乎其人者，存乎綬甲、逢祿、翔鳳也。今觀述祖〈答宋甥于廷書〉：

近撰《說文古籀疏證》，頗有新得，竊謂《連山》亡而有《夏小正》，《歸藏》亡而有倉頡古文。今就許氏篇旁條例，以幹支別爲敘次，亦始一終亥，名曰《黃帝歸藏甲乙經》，記字正讀，意欲以此書與《夏小正等例》，爲夏、商之《易》補亡，未知能竟其業否？如精力不繼而中輟，尚望吾甥與卿細續成之，炳燭苦短，無可寄聞，特以此博吾甥一拊掌耳。¹²¹

蓋述祖《夏小正》之學已成，則其爲夏《易》補亡之心願已達，然其由古文篆籀以溯古《歸藏》之心願尙未達成，乃冀望於翔鳳、綬甲、逢祿續成之。又述祖〈復從子卿珊詢古文大小篆書〉云：

¹²⁰ 李兆洛：〈莊珍藝先生傳〉，《養一齋文集》，卷15，頁8a。

¹²¹ 莊述祖：〈答宋甥于廷書〉，《珍藝宦文鈔》，卷6，頁24a。按：翔鳳撰〈莊珍藝先生行狀〉，自云每於郵書中聞舅氏發明《歸藏》之說，由以上書札可證。述祖卒後，翔鳳除撰〈行狀〉之外，亦賦〈撰舅氏莊葆琛先生行狀竟係之以詩即呈孫淵如觀察星衍三首〉，述二人之關係，詩中有言：「願得留此身，兢兢尋失墜。」(卷1，頁7b)蓋翔鳳感念述祖之作，屢於其《洞簫樓詩紀》見之，如〈和詩送玉菴意有未盡更附長句〉、〈過濰縣〉、〈常州書感〉等。其《尚書》之學，亦有得於述祖之傳。如《尚書譜》云：「嘗聞之葆琛先生曰……。」又云：「謹案：孔子序《周書》，自〈大誓〉迄〈顧命〉，皆《書》之正經，以世次，以年紀。其末序〈蔡仲之命〉、〈柴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五篇者，幼嘗受其義於葆琛先生，麤曉佔畢，未能詳記，奔走燕、豫，留滯梁、荆，函丈斯隔，七年於茲，茲譜《尚書》，細繹所聞而識之曰……。」(《過庭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00、121)至於書中以武王觀兵在九年；周公居東，罪人斯得爲管、蔡、武庚者，蓋得之於述祖之說，而述祖又得之於存與者也。又逢祿〈歲莫懷人雜詩十六章〉之十二，提到述祖：「廿年正《夏時》，絕學三代表；晚歲窮古籀，匡許到秋杪。至樂無與談，見我糜困倒；淫思欲骨立，諫果知味妙。」(卷11，頁13b-14a)蓋是詩於稱道述祖《夏時》、《說文古籀疏證》之外，又感念其諫學而使逢祿深知古籀之學的妙味，有托付其學於逢祿之意。今觀承寬〈行述〉所云，蓋逢祿亦有繼述祖窮研古籀之志，而事未能就也。其言云：「至于近世小學，但知溯源小篆，而古籀幾爲絕學，嘗病《說文》多有從所得聲之字，反不見于本書，而一字重文別體，或分收各部，又部首過繁，稽攷不易，嘗欲仿《爾雅》體，并其重俗，補其古訓，增其闕文，以省初學之心，俾得專心于大業，手書創藁而未能就也。」(卷11附錄，頁7b-8a)

余所述《古文甲乙篇》(後更名為《說文古籀疏證》)如此類者，皆以古籀文定之。冀為許氏拾遺補闕。但鍾鼎不比五經古文，有師說相授受，今以一人通其讀，竊恐斯事難專，況學植荒落，久病善忘，其不能卒業可以逆料，幸吾姪有同好，他日可為去其穿鑿，廣其陋略，刪其復重，是所淡望也，力疾率復，不盡欲言。¹²²

是述祖仍冀望其古文甲乙之學，能得綬甲賡續成之，然綬甲亦因天年所限，最終也無法完成述祖的托付。〈行狀〉云：「珍藝先生之歿也，《古文甲乙篇》尙未脫稿，君方思理其綸緒，就所知見條其大端，使來者可繼此志，亦竟不遂。」¹²³所以，在〈珍藝宦遺書序〉中，李兆洛再一次提到：

宗伯諸書，文孫卿珊已刻之，未竟而歿；大令之書，次子稚蕙曾刻《夏小正》數種，未卒業；今幼子文灝盡以付梓，書幾百卷，不能竟刻，多刊序例，使讀者可尋繹。又合他文及詩為遺集并刊焉。為莊氏學者，于此可以得其大凡矣。而若士、申受、卿珊、稚蕙皆已歿，不及與校訂之役，甚可悼也。則邠農之勤勤刻是書者，誠不可緩矣。若士、申受所著《公羊》之說，多本宗伯；卿珊搜覽漢學，亦能紬繹先生之旨。稚蕙沈默如先生，思究《古文甲乙篇》，終始補成之，而未及竟，皆傑然自立於學者。後之聞而興者，能無望乎！¹²⁴

這是吾人讀莊氏著作應注意的文獻，莊存與之遺著由綬甲刻之，然未竟而歿；莊述祖之遺著，則由次子稚蕙、幼子文灝賡續刊行，然亦以卷數過夥，僅能刊刻序例及詩文集。後人於莊氏學術，僅能得其輪廓，與綬甲、逢祿等人之早歿，未及系統整理存與、述祖學術，有一定的關聯。至於李氏提到「卿珊搜覽漢學，亦能紬繹先生之旨」，亦是有據之言，今觀《珍藝宦遺書》卷首有莊綬甲所撰〈珍藝先生像贊〉，其言云：

磐磐名儒，經師人師，孝友純固，廉節堅持。生平學業，萃於《夏時》，櫟栝董、胡，規模等差，文辨壁書，義窮聲《詩》，官禮通貫，古籀心知，源探甲乙，倉史克追，齟聲肇譜，古音長垂，經術湛漬，鬱為吏治，勸強扶弱，威振仁施，儒林循吏，兼而成之，儀頌肅然，長此懷思。道光七年歲

¹²² 莊述祖：〈復從子卿珊詢古文大小篆書〉，《珍藝宦文鈔》，卷6，頁27a-b。

¹²³ 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卷12，頁32b。

¹²⁴ 李兆洛：〈珍藝宦遺書序〉，卷3，頁19a-b。

在丁亥季冬朔辰會，從子綬甲敬題。¹²⁵

這是綬甲對述祖生平為政與學術的概括，也可以視為是綬甲整理述祖學問的心得，惟以遽亡，其志亦竟不遂，誠可哀也已。綜合《莊氏族譜》、《光緒武陽合志》、《清代毗陵書目》所載，綬甲的著作計有《周易古本》一卷，已佚；《尚書考異》三卷¹²⁶；《周官禮鄭氏注》十卷，已佚¹²⁷；《釋書名》一卷¹²⁸；《遷改格》不著卷數，已佚¹²⁹；《文鈔》一卷，《詩鈔》一卷，《詞鈔》一卷¹³⁰。另外，綬甲曾言欲纂《尚書集解》而未能完成¹³¹；又據譚獻所云，尚有《石鼓考證》¹³²，

¹²⁵ 莊綬甲：〈珍藝先生像贊〉，《珍藝宦遺書》，卷首。

¹²⁶ 按：此書原為二十九卷，後散佚，僅存十四卷，今所存三卷本，為其子潤所改編而成。據莊潤跋云：「原稿脫佚，僅存一十四篇（〈堯典〉至〈金縢〉），〈大誥〉而下，有錄無書。」莊潤：〈尚書考異跋〉，《尚書考異》，附錄，頁1a。

¹²⁷ 按：宋翔鳳詩云：「家法相傳世不輕，絳帷同拜鄭康成，山河兩戒勞車馬，參井三年憶弟兄，廢疾當為《周禮》起，微言要在孔書明，時輯鄭氏學。告君窮達渾閒事，莫以糊名誤此生。」是詩繫於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點出綬甲正輯鄭氏《周禮》學，並有所針砭。又綬甲有〈周官記跋〉，備言其祖莊存與《三禮》學之始末，並言已方法鄭君箋《毛》之義，纂《周官禮箋》十卷，此當即《清代毗陵書目》所載之十卷本《周官禮鄭氏注》。跋文作於道光七年（丁亥，1827），並云：「為之有年矣」。又按：光緒元年增修《毗陵莊氏族譜》，著錄綬甲著作有《尚書考異》、《釋書名》、《遷改格》、《拾遺補藝齋詩文集》，然未見《周官禮箋》，則是書光緒前業已亡佚，更有可能在道光十八年李兆洛刻綬甲遺書時，連同《尚書考異》的〈太誓〉以下篇章，一併亡佚。宋翔鳳：〈秋日懷人詩·莊卿山外兄〉，《憶山堂詩錄》，卷4，頁17b；莊綬甲：〈周官記跋〉，《拾遺補藝齋文鈔》，頁37b。

¹²⁸ 按：《光緒武陽志餘》注云：「是書……首論《河圖》、《洛書》、八卦為造字之始；次及六書、八體，及魏、晉以來字書；末詳簡策筆墨縑紙之屬。自為注，詳其出處。書名賅博古雅，亦初學必讀之書也。」是書有《拾遺補藝齋遺書》本、光緒十五年木活字本及《丁丑叢編》本，今光緒本未見。〔清〕莊毓鉉等纂修：《光緒武陽志餘》（《中國地方志集成》，第38冊影印清光緒十四年活字本），卷7〈經籍〉，頁92b。

¹²⁹ 按：張惠言有〈遷改格序〉，略云：「吾友莊君卿珊寡言而力行，好學不倦，與其同志陸君紹聞，取明人功過格，正之以禮，明其統例，名之曰『遷改』。余以為君子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唯無求其報應福利而已，非昧昧于善惡之輕重，而曰吾明道不計功也。卿珊之為此，其諸以為禮之律令與？故為說《易》之言遷善改過者以序其篇。」張惠言：《茗柯文》，第2編，卷上，頁34a。

¹³⁰ 按：《文鈔》、《詩鈔》、《詞鈔》暨《尚書考異》、《釋書名》共五種七卷，收入道光十八年李兆洛所刻《拾遺補藝齋遺書》，現存北京圖書館，計有刻本及手抄清樣二種，清樣未見《詩鈔》、《詞鈔》。

¹³¹ 莊綬甲：〈尚書既見跋〉，《拾遺補藝齋文鈔》，頁36。又按：述祖、綬甲、逢祿皆有纂《尚書集解》之役，最後由逢祿在述祖的基礎上完成之，此猶古韻二十部經述祖、惠言、成孫乃成，亦是常州學派累積性研究之一例。

¹³² 〔清〕譚獻：《復堂日記》（臺北：新文豐文化公司，1989年《叢書集成續編》，第218

實則爲〈石鼓文考證〉，收入文集中；又兆洛言綬甲有意撰《十三經異文》，惜中道而歿，則是《十三經異文》亦未有成書也¹³³。又云：「君子經義無不窺，有所得輒劄記之，往往有精詣，惜未有成書。」¹³⁴至於「所爲古文幾百篇，亦叢殘不成篇帙」¹³⁵，而所遺殘稿中有端緒可尋者尚十之三四，李兆洛寄望綬甲之子能引其餘緒，通其條貫，上以繼先人之志，而下足以自成其業¹³⁶。這些斷簡零編，業已爲化爲塵土，無從覓見了。

綬甲著作，略已如上所述。其中，《周官禮鄭氏注》雖已亡佚，然據綬甲〈周官記跋〉自記，是書殆可以視爲繼承存與《禮》學之作。至於〈周官記跋〉本身，則是一篇存與《禮》學之提要，對我們掌握存與的《禮》學內涵，有相當大的幫助，拿來和存與的〈序冬官司空記〉及李兆洛的〈周官記序〉合參，更有助於吾人掌握《味經齋遺書》之一貫精神。綬甲首先指出存與治經之途徑，是先由《三禮》之學入手，且最致力於《周官》之學。存與認爲〈冬官〉是《周官》之精華，故其《周官》之學的重點在於爲〈冬官〉補其亡闕，如存與在〈序冬官司空記〉中所言：「夏王之作司空，周公之建事典也，其道甚著，萬世卒不可廢，安可泯沒哉！」¹³⁷其目的是要通貫六官，以陳一官之典，而其潛臺詞則是否定鄭玄的〈考工記〉足以補〈冬官〉之缺。由存與手定者，除《周官記》、《周官說》之外，尚有綬甲於遺稿中檢得零章斷句及批注簡端者，并錄而編之，成三卷，爲《周官說補》，補錄附後，都爲十卷。其次，綬甲提到存與治《禮》，本鄭氏學，又遍觀唐、宋、明以來說《禮》之書，擇善而從，爲鄭氏拾遺補闕。其實，整體的從《味經齋遺書》來看，存與對鄭玄不止是拾遺補闕而已，而是以批判的態度，目其爲使後世不能得知聖王天道的千古罪人，其程度之烈，不下於存與對王弼、朱子的批判¹³⁸。最後，綬甲提到他見到存與之作而好之，乃仿鄭氏箋《毛》之義，爲《周官禮箋》十卷，蓋已行之有年¹³⁹。惜其書已佚，無由見此《周官禮箋》

冊)，卷7，頁10b。

¹³³ 李兆洛：〈錢子樂十三經斷句序〉，卷3，頁15a。

¹³⁴ 李兆洛：〈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卷14，頁42a。

¹³⁵ 李兆洛：〈拾遺補藝齋遺書序〉，卷3，頁8b。

¹³⁶ 同前註，頁9b。

¹³⁷ 莊存與：〈序冬官司空記〉，《周官記》（《續修四庫全書》，第80冊影印清嘉慶八年味經齋刻道光七年滙印《味經齋遺書》本），卷首，頁3a。

¹³⁸ 按：有關莊存與對鄭玄、王弼、朱子的批判，請參拙著：《常州莊氏學術新論》，第4章，第4節。

¹³⁹ 莊綬甲：〈周官記跋〉，《拾遺補藝齋文鈔》，頁37b。

之詳略。

綬甲著作最值得注意者，是《尚書考異》與文集中涉及《尚書》的相關篇章。《考異》雖非完帙，仍是討論常州學派《尚書》學的重要文獻，配合文集相關的敘述，可以窺見常州學派三代之間學術積累的過程，其中存與、述祖重要的《尚書》學觀點，如以《詩》、《書》、《春秋》相通，闡發聖王微言大義；如對荀子、劉歆的批駁；如堅信〈書序〉、《孟子》；又如堅持周公相成王而批鄭玄之注「罪人斯得」為誣妄之言等等，皆在綬甲的著作中有進一步的引伸。

首先是〈尚書既見跋〉，此文是了解莊氏《尚書》學的重要文獻。首先，綬甲指出存與觀聖人天道之常變者，在於《詩》、《書》，故生平於《詩》、《書》之學最明¹⁴⁰。綬甲此說，與後世專從學術影響的角度，將焦點放在《春秋正辭》上，有相當大的距離。其次指出命名「既見」者，「取《書》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之意也」¹⁴¹。其次指出存與立說多取之於〈書序〉之因，乃以《書》為孔子論次，〈序〉與《書》相表裏，別嫌明微，推見至隱，與《春秋》同義，非聖人不能作，亦非游、夏所能贊¹⁴²。其次則說明存與不廢古文之因：

初亦以今文、古文不同授讀先父、仲父輩，分別寫錄為課本，後見閻微士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攻訐過甚，歎曰：「此啓後人變亂古經之漸，《五經》將由此糜爛矣。漢、唐以來，聖教衰微，獨賴有《五經》在，猶得依弱扶微，匡翊人主，默持世道，安可更有興廢哉！」于是屏不敢加以辨駁，且謂古文多精理粹言，故《既見》一書，開宗一章即論列〈禹謨〉，餘說經之作，亦多徵引古文，欲以彌縫經傳，尊保彝訓，心至苦矣。¹⁴³

此段文字，可與龔自珍所撰存與神道碑相參，蓋龔氏文章重點亦在為存與不廢偽古文辯護，並表明存與所重於《尚書》者，在於對皇室教育的功能，其說即來源綬甲所述¹⁴⁴。《尚書既見》由述祖出資出刊，綬甲整理，條其大旨：

一卷首篇正後儒之誤解〈禹謨〉為再征有苗，重為《書》誣，因以明不攻古文之意；次篇釋〈盤庚〉而證以二〈雅〉，因以著以經解經之法；三篇闡《書》之言天言命言性至明確，而恠後儒鹵莽讀之也。二卷皆論周公相武王

¹⁴⁰ 莊綬甲：〈尚書既見跋〉，《拾遺補藝齋文鈔》，頁34a。

¹⁴¹ 同前註。

¹⁴² 同前註。

¹⁴³ 同前註。

¹⁴⁴ 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龔定盦全集類編》，頁295。

輔成王之事，一衷於經與〈序〉，以明文、武之志事，述顯承之艱難，辨成王不能涖阼、周公踐阼攝政之誣。三卷皆論舜事父母之道，以孟子之言為本而證明《逸書》。後述伊尹、周公之遇，皆所以明聖人之於天道也。¹⁴⁵

存與《尚書既見》，乃常州學派《尚書》學的總綱，三代之間信守不渝，皆所以明聖人之於天道，綬甲所隱括，可謂得其根本¹⁴⁶。接著介紹述祖與存與《尚書》學之異同：

從父珍藝先生從大父講授，有《尚書駁議》、《尚書授讀》之著，亦考信於〈序〉，有《書序說義》之著。從父嘗嘆曰：「《書》所著蓋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世父是也；予則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一時學者因目大父與從父為大、小夏侯焉。恪守家法，亦不為墨守，如今文、古文則從閻氏、惠氏之說，大指則無不合揆云。¹⁴⁷

洪亮吉盛稱莊氏「家世傳學，則有夏侯」¹⁴⁸，綬甲詩云「願為小夏侯，傳業老伏生」¹⁴⁹，參諸綬甲此處所述，亦可推知在乾嘉之際，莊氏家族並不只是以《春秋》見重當世，至少還要加上《尚書》之學。述祖恪守家法，指的是相信存與據〈書序〉發論，重在聖人之於天道的探研，不因講求實證的考據學方法引進而放棄；不為墨守，指的是述祖有分別今、古文的意識，並且基本上不信偽古文，與存與於偽古文多所徵引，不敢辨駁者異趣。最後，綬甲自述鑽研《尚書》的大略：「從父於諸兒子中，尤好為綬甲講論，令為《尚書考異》；綬甲又私述所聞，為《尚書集解》，以《詩》、《書》通《春秋》之大義，冀承先業而未能也。」¹⁵⁰《詩》、《書》與《春秋》相通之說，創自存與解《毛詩》〈雨無正〉之章，頗為其後人所重視，既見於逢祿《書序述聞》、《尚書今古文集解》¹⁵¹，以及翔鳳《尚書

¹⁴⁵ 莊綬甲：〈尚書既見跋〉，頁3a。

¹⁴⁶ 有關莊存與、莊述祖《尚書》學的詳細討論，請參拙著：《常州莊氏學術新論》，第4、5章。

¹⁴⁷ 莊綬甲：〈尚書既見跋〉，頁35b。

¹⁴⁸ [清]洪亮吉：〈南華九老會唱和詩序〉，《洪北江詩文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上冊，頁233。

¹⁴⁹ 莊綬甲：〈乙亥初夏客遊白門孫淵如觀察招遊五畝園賦贈兼示南麓芸葵兩別駕〉，《拾遺補藝齋詩鈔》，頁22b。

¹⁵⁰ 莊綬甲：〈尚書既見跋〉，頁35b。

¹⁵¹ 按：逢祿《書序述聞》自〈費誓〉以下，皆發此義，大略乃仿變風、變雅之義，而有正書、變書之說。又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釋〈文侯之命〉引存與之言曰：「謹案：莊宗伯《毛詩說》以〈雨無正〉之二章『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刺攜王奸命也。……〈正月〉之九章云：『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刺平王之不復宗周也。合《詩》、《書》以

譜》之末，亦見於綬甲〈尚書既見跋〉、〈詩書春秋相通論〉及〈上孫觀察星衍書〉諸篇之中，至於《尚書考異》，因〈大誥〉以下亡佚，已無由考見綬甲據〈蔡仲之命〉、〈柴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諸文對《詩》、《書》、《春秋》相通之說進行具體而詳盡的論述了。

綬甲文集中關於《尚書》之討論，尚需注意者為〈上孫觀察星衍書〉，可歸納出兩個重點，首先是對孫星衍《尚書》之學的概括與評論。文中稱讚孫氏於文集及《尚書義疏》中，於古、今文同異，稽覈極備。其中，斷伏生所見乃古文本經，而自授鼂錯，傳教博士之後，始為今文。然自唐之陸、孔，近世閻、惠諸君，皆未能發此義。又盛推孫氏於馬、鄭古文之學素深，故參之今文，各求其是，誠有從善服義之公心，而無專己守殘之私意。例如唐虞象刑、洪範曰容，皆典要不刊之訓；五服五章，獨能博采傳記，疏證《大傳》，較勝鄭義。而鄭玄十二章、九章之說，綬甲亦曾斷以文家說，於諸經若合符節。所以他認為《尚書》雖非完帙，然若能與它經互證，並且於今、古文經師之說，以得其真為要而不偏廢，如此則典、謨、訓、誥之義，二帝、三王之統，猶可尚論具世而心知其義¹⁵²。此說看似卑之無甚高論，實則是呼應孫星衍、莊述祖對王鳴盛等人治《尚書》專重鄭玄的批評，綬甲「有從善服義之公心，而無專己守殘之私意」的論述，蓋有其現實之意義存焉。其次則鉤勒家族的《尚書》學見解，其言云：

《五經》惟《詩》、《書》尤與《春秋》相通，故以讀《春秋》者讀《詩》、《書》，無不可得聖人微言大義，自七十子喪後，弟子人人異端，荀卿氏之儒獨陋，戰國詭誕之說，皆出于是。漢氏惟董君、毛公學最醇，能扶經之心，以貽後學，雖精如鄭君，猶不能不沿其說。故為《尚書》，必斟酌於古、今文而折衷于百篇之〈序〉，可勿畔於聖。鄭氏之失，有必宜是正者，如周公稱王之解，〈金縢〉罪人之訓，皆襲荀卿氏陋儒之論。達神旨者，理而董之，二十八篇之《書》，咸可盡信矣。¹⁵³

這是一段非常具有特殊性的陳述。筆者一再強調，常州學者即使從事學術研究，也必寓有其特殊的經學政治觀於其中。這也就意味著即使掌握了考據學的方法，其治《尚書》仍是將興趣放在尋求潛在於經文深處的微言大義，以及描寫理想的

觀，而平王之罪自見，《春秋》所以作也。」劉逢祿：《書序述聞》（《皇清經解續編》，第5冊），頁51b-55a；《尚書今古文集解》（《皇清經解續編》，第6冊），卷28，頁3a。

¹⁵² 莊綬甲：〈上孫觀察星衍書〉，《拾遺補藝齋文鈔》，頁45b。

¹⁵³ 同前註。

聖王境界，以達致藉由純化學術以純化政治的目的。與力求出以客觀態度，淡化政治性適用，並從事經典復原工作的樸學家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其所強調《詩》、《書》、《春秋》相通，一衷於〈書序〉，而痛批荀卿、鄭玄者，表面上仍是一般性的學術評論，隱藏在後的卻是立足於以《尚書》學的特殊詮釋為背景的經學政治觀，《尚書》在莊氏學者眼中，具有崇高而神聖的意味在內。

另外，由述祖命綬甲纂《尚書考異》推之，則綬甲、逢祿、臧庸、潘準等人《五經考異》之編纂，也有可能是受述祖之命，廣其《五經小學述》之意而作者。至於《尚書考異》，雖大旨歸宗存與，然表現之法，則頗受述祖分別古、今文字以推今、古文經典文本之法的影響。今觀其〈敘目〉開宗明義即指出，影響《尚書》文本面目的主要原因，不在於經學上有今、古文之分，而肇於唐天寶之改今字與宋開寶之改《釋文》，此舉使經文淆亂，即便是東晉偽古文之本，亦非其真，至於舊典之遺，更是已鮮概見。正如「司農之註，厥有先後；夏后之傳，遞分大小；鄭君答問，猶經小同而纂成；戴氏記文，迭諸次君而備著」，所以他也要繼父、祖之業，志古之道，本之家言，著以師說，並博采廣搜，摺摭殆盡，沿流溯源，尋文考義，于以循習東、西京之家法，別擇古、今文之遷流，咸可窺觀其大義，隱約于微言。也要「考信前哲，博訪通人」，如閻若璩、惠棟、戴震、錢大昕、王鳴盛、王念孫、孫星衍、江聲、段玉裁、阮元、陳壽祺、王引之、徐直卿、臧庸、宋翔鳳等，諸家「各著篇章，頗宣義訓，或左右采獲，而未必盡同，或問難往來，而其歸合轍」¹⁵⁴，所以他謹就唐《正義》本別白丹鉛，不錄宋以後書，至句度音讀有互異者，也一并討論¹⁵⁵。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大誓〉的態度。與其從叙述祖不同的是，述祖對〈大誓〉非常重視，文集中既有〈大誓序說〉¹⁵⁶、〈書校定太誓三篇後〉¹⁵⁷，且在《尚書今古文考證》中，不但以三章篇幅考證〈大誓〉本文，也考證〈大誓〉序¹⁵⁸，更重要的是，他充〈大誓〉於今文二十八篇之列，認為〈大誓〉比〈武成〉更為可信，並藉考辨武王伐紂之年攻擊劉歆竄亂經

¹⁵⁴ 莊綬甲：〈尚書考異敘目〉，《尚書考異》，卷首，頁1b。

¹⁵⁵ 同前註。

¹⁵⁶ 莊述祖：〈大誓序說〉，《珍藝宦文鈔》，卷3，頁1a-5b。

¹⁵⁷ 莊述祖：〈書校定太誓三篇後〉，同前註，卷5，頁33a-34a。

¹⁵⁸ 莊述祖：〈大誓考證·上·中·下〉、〈尚書序考證·大誓〉，《尚書今古文考證》，卷6，頁1a-17a、卷7，頁8a。

說¹⁵⁹。述祖關於〈大誓〉的討論，頗受孫星衍重視，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特別將〈大誓〉列入今文二十九篇之列，此舉是否受述祖影響，尚待進一步考證。然孫氏於疏中兩次徵引述祖之說，亦可見述祖關於〈大誓〉的討論，有其可取之處¹⁶⁰。綏甲則以《尚書大傳》及《史記》皆不載，故僅復其篇卷，本其時代，考辭就班，仍斗四七宿之法，從逸十六篇之遺。並特別解釋何為逸書：「所謂逸者，博士既皆不肯，秘史亦罕流傳，殆以後學私記，駁于七十二子，不同前史，國典崇諸。」¹⁶¹簡單來講，就是沒有師承授受紀錄者。惟《考異》自〈大誥〉¹⁶²以下既已亡佚，無由見其考論之梗概，僅以譚獻所記補充之：

莊卿珊《尚書攷異》，〈金縢〉以下未成。大旨謂有《夏書》，凶《虞書》，二十八篇而外，佚篇不出于孔門。文字忒取，不甚勇改，謂段茂堂之拘《說文》，孫伯淵之信《史記》，皆不為定論，大都得之珍菀先生為多。然（述祖）《今古文攷證》尚采〈泰誓〉，卿珊以為得自民間，不入二十八之列，尤謹嚴矣。¹⁶³

由譚獻的敘述得知，綏甲主要的《尚書》學觀點，都得之於述祖，惟有對於〈泰誓〉的看法，綏甲與述祖不同。譚氏所記，尚有兩點值得注意者，其一則為對《夏書》篇題的堅持，其一則為對段玉裁、孫星衍等人的批評。來看莊潤〈尚書考異跋〉的介紹，他說：

先君子受業先從叔祖珍藝先生，盡通曾王父宗伯公《公羊春秋》、《毛

¹⁵⁹ 莊述祖《大誓序說》云：「十有一季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季也。九季會諸侯於孟津，十有一季伐紂。……劉歆欲立古文《尚書》，移讓諸博士，不肯置對者，則所云《書》十六篇，歆得其真矣。而《三統》以為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再期而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季，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季，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季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與今文說異，同東晉古文。太史公《書序》《洪範》次《分器》，先《金縢》，在克殷後二季，與《書序》今第異，伏生《傳》亦云，視劉歆以《洪範》之十三祀為伐紂之歲，於義為長，其說在《洪範序》。惟以《大誓序》所云十一季，統文王受命數之，其誤則一。存其說，本諸經以燕其疑，俟後之君子。……今文《大誓》雖晚出，然去古未遠，視《克殷》、《世俘》為近實，亦周史記之文，不過非百篇中《大誓》耳。……故以《大誓》今文充學，痛于以《世俘》為《武成》也。」見《珍藝宦文鈔》，卷3，頁1a-4a。

¹⁶⁰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78、279。

¹⁶¹ 莊綏甲：《尚書考異敘目》，卷首，頁1b。

¹⁶² 按：綏甲依古文之序，列《金縢》於《大誥》之前，與伏生《大傳》及今文《尚書》列《大誥》於《金縢》之前異。

¹⁶³ 譚獻：《復堂日記》，卷7，頁10b。

詩》、《周官》之學，而于《尚書》尤精，以為讀書必先審正字讀，乃可進求誼理。歲己巳，始為《尚書考異》，……大旨凡有三端焉：鄭氏〈書贊〉稱《尚書》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故據周錄夏，上法唐、虞，則加稽古之文，此《春秋》通三統之義也。然則不特東晉古文分題《虞》、《夏》為非，即伏、鄭《尚書》兼題《虞夏》亦非古義矣。是書循《春秋》之義，定《夏書》之名，一也；〈大誓〉一篇民間後得，馬氏所疑，後儒紛紛，或謂伏生所無閻微君百詩、段大令懋堂說，或謂壁藏所有惠徵士定宇、王光祿鳳階、王伯升說，是書考四七之文，采《正義》之是，刪厥篇題，用昭古義，二也；又《尚書》之學，至國朝而大明，雖剖析遞因，亦純疵互見，統論宏旨，則章句不循，是正文字，則故訓是略。又如王光祿之篤守鄭誼，孫觀察之惟信馬遷，段大令之專崇《說文解字》，宗旨既分，主奴互見，先君子是書，兼裁眾有，各剖是非，驪黃已別，則好古信從；朱紫尚淆，則獨下己意，剖白定尊，無使學者疑，三也。¹⁶⁴

莊潤所記，正可為譚獻之言做註腳。首先，關於莊氏學術累積性研究的記載，在此又得一佐證。其次，堅持《夏書》之篇題，與家族獨特的《春秋》學見解密切相關。對於〈大誓〉的紛爭，亦是一以今文《尚書》篇次為準，刪厥篇題，以昭古義。至於當世學者討論《尚書》，不論是王鳴盛的篤守鄭誼，或是孫星衍的惟信馬遷，還是段玉裁的專崇《說文解字》，在綬甲看來，其立場各有偏坦，是書則兼裁眾有，各剖是非，有定論者從之，尚淆亂者獨下己意¹⁶⁵。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莊綬甲的自我敘述，還是譚獻、莊潤的介紹，都指向一個現象，即《尚書考異》既欲兼採眾家、帖合樸學理趣；亦要堅持家學、尚論聖王天道，可以說是宗旨、方法互異的兩種學風之融合，這種情形在《尚書考異》僅存的篇卷中，隨處可見，舉綬甲論《虞書》為例：

《正義》云：「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孔則虞、夏別題。師說當直題曰《夏書》。謹按：《墨子·明鬼》篇曰：「《尚書》夏《書》，其次

¹⁶⁴ [清]莊潤：〈尚書考異跋〉，《尚書考異》，附錄，頁1b。

¹⁶⁵ 徐震云：「莊氏之學，為清代今文家所由昉，而先生述古文諸經，仍據班書，不云出於劉歆偽造，尊信舊聞而不穿鑿，謹嚴之度，亦足多也。」[清]徐震：〈釋書名序〉，見莊綬甲：《釋書名》，卷首。

商、周之《書》。」明《書》惟有三代。蓋孔子刪《書》，義同《春秋》，皆據周而錄二王，運之三代，文雖斷自〈堯典〉，《書》則廩于夏后，亦以明三統也。至上錄唐代，則加「曰若稽古」之文，以上古之書亦在《夏書》中也。故鄭〈贊〉亦曰三科之條。夫既曰三科，則稱《虞夏書》者，猶為牽合之詞，不若直稱《夏書》之得；其但稱《虞書》者益非，何以更處乎《唐書》邪？《大傳》有《虞夏傳》，是漢代經師推本事以加之，馬、鄭諸家遂依之。《正義》云：「漢、魏諸儒同伏生，從〈堯典〉至〈允征〉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固非如周時親見國史者之得真矣。」《左氏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引〈皋陶謨〉「賦納以言」三語為《夏書》，杜預《註》云「《虞夏書》也」。惠徵士棟《補註》云：「《尚書》二〈典〉，總謂之《夏書》，此孔子刪《書》之本也。今文家增為《虞夏書》，東晉古文又改為《虞書》，皆非孔氏之舊。《左氏》引今所謂《虞書》者，皆為《夏書》，惟文公十八年有云『《虞書》數舜之功』，說者以此篇為劉歆點竄，此亦其一證耳。《大傳》又分《唐傳》、《虞傳》，《說文》亦稱《唐書》、《虞書》，亦于本事細別言之，非典要也。顧炎武固謂〈堯典〉亦《夏書》，良是，今從之。」¹⁶⁶

吾人可以很明顯看出綏甲此處表現的方法，與樸學家的考證方式，並無二致，都是列舉各家之說為據，以證成其觀點。與莊存與的純出乎文章，或是莊述祖的考證兼夾議論相比，在形式上，至少是更接近漢學家慣有的方式。但在本質上，綏甲的考證仍有其基本立場，表現在他對師說，即述祖之言的遵從。主張將《虞夏書》改為《夏書》的說法，自孔穎達經顧炎武至惠棟，不曾斷絕，但是他們並不曾比傳《春秋》三統之義；相反的，在綏甲的論證中，他充分運用家族《春秋》學三科之旨，與《尚書》做比傳，認為孔子刪《書》，義同《春秋》，皆據周而錄二王，運之三代，文雖斷自〈堯典〉，《書》則廩于夏后，所以明三統也。既據周而錄二王，則所運之三代是夏、商、周三代，所明之三統亦是夏、商、周三統，準此一理論，《尚書》在篇題上，不應該有題《虞夏書》或《虞書》的情形，只能題作《夏書》，否則不合三科之義。其有上錄唐代者，則加「曰若稽古」之文以別之，亦所以廩三代之義。所以，所謂的「兼裁衆有，各剖是非」，指的是一般的《尚書》學問題，至於核心觀點，則仍是惟師說是從。

事實上，不僅綏甲的《尚書考異》充滿了述祖的身影，劉逢祿、宋翔鳳的著

¹⁶⁶ 莊綏甲：《尚書考異》，頁1a-b。

作亦是如此。今觀翔鳳〈虎坊橋雜詩十二首〉之九所云：

漆書非散佚，北斗宿當中，王肅詞難合，劉歆說已通，余說《尚書》，外兄劉申受頗以爲是，近與王伯申學士論之，不甚相合也。古文真朽蠹，大義付冥鴻，寥落塵寰裏，何人識宋衷。¹⁶⁷

逢祿之所以頗以翔鳳說《尚書》爲是，即在於二人系出同門，與新城尚書的段、戴學風自不相得¹⁶⁸。另外，來看譚獻的記載：

閱《過庭錄》五卷，宋氏說《書》推莊先生遺緒，爲逸十六篇本不足信之說，未嘗不持之有故，究未可爲定論。〈舜典〉附入〈堯典〉，則僞古文判爲二篇，未爲巨謬。〈益稷〉與〈大禹〉、〈皋陶謨〉同〈序〉即同篇，僞名淆濶，非〈呂刑〉、〈甫刑〉之比也。且〈康誥〉、〈酒誥〉、〈杼材〉同〈序〉異篇，〈書序〉之例如此，不容無說者即同篇。閱劉申受《書序述聞》，說《尚書》精深，源于宗伯公。吾故謂莊氏家學精于惠、大于王矣。¹⁶⁹

譚獻言翔鳳說《書》推莊先生遺緒，莊先生即述祖。今觀翔鳳《尚書說略》、《尚書譜》如論虞夏同科之義、論武王伐殷之年、論周公攝政、論〈書序〉數篇合爲一篇或一篇分爲數篇之情形，皆本諸述祖之說¹⁷⁰。又譚獻言逢祿說《尚書》精深，源於宗伯公。蓋其《書序述聞》及《尚書今古文集解》本爲紹述述祖一家之學，而述祖關於〈書序〉、《尚書》之討論，又是闡發存與之說而來，此譚獻所以言逢祿源於宗伯公者¹⁷¹。綬甲、逢祿、翔鳳三人皆學於述祖，故三人的《尚書》學實爲相同之系統，此爲研究常州學派第三代學者所須注意者。

綬甲所傳述祖之學，猶有可說者，即古文篆籀之學。綬甲與述祖討論古文篆籀之證，見於〈再答從叔祖父保琛先生〉，而完成之著作，則爲〈石鼓文考證〉與《釋書名》。先來看〈石鼓文考證〉。譚獻云：

卿珊文鈔，扶質立幹，自成經生門徑，〈石鼓攷證〉，出于〈燃疑〉，而益暢其說。汪容父氏之言，遭其摧拉，不得不畏後生。而以書迹爲集字而

¹⁶⁷ 宋翔鳳：〈虎坊橋雜詩十二首〉之九，《憶山堂詩錄》，卷5，頁7b。

¹⁶⁸ 相關討論，尚可參宋翔鳳：〈與王伯申學士書〉、〈與陳恭甫編修書〉，《樸學齋文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二十五年刻《浮谿精舍叢書》本），卷1，頁28、30。

¹⁶⁹ 譚獻：《復堂日記》，卷1，頁3b-4a。

¹⁷⁰ 宋翔鳳：《過庭錄》，頁85、88、100。

¹⁷¹ 按：逢祿學《尚書》於述祖之記載，見劉逢祿：〈跋杜禮部所藏漢石經後〉、〈尚書今古文集解序〉，《劉禮部集》，卷9，頁20a-21a、2a-3a。

成，竟與予二十季持論脗合，亦一奇也。¹⁷²

按〈然疑〉者，即莊述祖所撰〈石鼓然疑〉也。述祖有論北周出土石鼓文之文字三篇，依序爲〈舊拓石鼓文跋〉、〈石鼓然疑〉及〈復從子卿珊詢古文大小篆書〉，觀點前後不同。在〈舊拓石鼓文跋〉中，以爲石鼓文乃先秦古物；至〈石鼓然疑〉及〈復從子卿珊詢古文大小篆書〉則推翻前說，以爲出於蘇綽、盧辨之制作，其〈石鼓然疑〉即爲疏證此觀點而作者。今觀述祖所云：

余向時以石鼓多與大篆合，頗不信馬定國字文時物之說，及檢《後周書》有數事可與石鼓相證，作〈石鼓然疑〉一篇，所云「不證以事而證以文」，亦彼此互見者也。詩辭蓋出於蘇令綽、盧景宣二人之手，故石鼓自唐始顯，即表章於綽曾孫勗，一時盛傳，皆以爲宣王時古籀書也。唯張懷瓘知其假託，又不敢顯然立異，《書斷》於大篆外，別爲籀文，且云：「其迹有石鼓文在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則以石鼓間雜小篆故也。」是其識過章、韓諸公遠矣。¹⁷³

〈石鼓然疑〉之論如此，〈考證〉既出於〈然疑〉，其論亦相去未遠。今觀綬甲所云：「或以爲字文周時，則以史考之，曰獵、曰漁、曰雨、曰脩塗，事俱適合，見余從祖叔父〈然疑〉篇中。且其詞故蘇綽、盧辨所爲也。何則？其時籀書已亡佚，惟此二人獨爲識古文，又石鼓自唐始出，即表章於綽之孫勗，知其有所受矣。然綽特輯古書以載今事，而勗乃臧今事以冒古書，則蔑先亂古者，勗也。」¹⁷⁴其論調與述祖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述祖在此中所透露出的古文字學觀點。蓋〈石鼓然疑〉不過是述祖《說文》古籀之學的副產品，在現存所見述祖的著作中，留有大量關於古文字學的討論文字，除了校勘異文，分別家法之外，也企圖建立一套比小篆更早的古文字系統，以回復古代的《歸藏易》。其方法是透過蒐集現存各種鐘鼎文獻以及《說文》所載在內的古文大篆籀文，依照許氏始一終亥的方法繫聯，希望能夠透過此一繫聯，找到古人撰作文字所蘊涵之制度精神，其思路頗有漢字文化學的意味。他認爲此一精神是黃帝正名之教，亦是古代《歸藏易》的精神。爲了突出他的理論，他必須對文字的源流演變有清楚的了解，並且對李斯小篆以下的文字演變情形提出批判，這些文字既表現在他的《尚書》學著作裏，

¹⁷² 譚獻：《復堂日記》，卷7，頁10b-11a。

¹⁷³ 莊述祖：〈復從子卿珊詢古文大小篆書〉，卷6，頁26b。

¹⁷⁴ 莊綬甲：〈石鼓文考證〉，《拾遺補藝齋文鈔》，頁31b。又按：綬甲〈再答從叔祖父保琛先生〉一文，對石鼓文來歷之觀點，亦與此同。

也大量的以書信或序跋的方式表現出來，留在他的文集中。所以欲觀述祖的古文甲乙之學，除了其子所刊之《說文古籀疏證》目錄及凡例外，文集中關於古文字的討論更是重點。而他也將其心得與綬甲分享，例如在與綬甲的信中，他解釋了大篆別稱籀文之原由。他說：

詢張懷瓘於大篆之外，別列籀文之說，前書辭不達意，茲復悉言之。古文大、小篆之名，始於秦漢之際。古文謂伏生、張蒼、竇公、孔安國所獻，及郡國閒得鼎彝古器物銘文；大篆謂史籀十五篇；小篆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造。至閭里書師合〈爰歷〉、〈博學〉於〈倉頡篇〉，學者但謂李斯作小篆，不復知有趙高、胡毋敬之說矣，此亦上蔡莫白之冤也。況可仞爲倉史遺文邪？以小篆而有篆之名，以今文而有古文之名，其實大篆亦古文也，故《呂氏春秋》謂倉頡作大篆，安得大篆之外，別有籀文邪？¹⁷⁵

在述祖看來，大篆即籀文，之所以大篆有籀文之別稱，答案就在北周石鼓文之偽造。至唐張懷瓘知其爲假託，又不敢顯言，乃託言石鼓之文爲籀文，以與大篆立異。述祖關於文字源流正變之論說，雖星散見於各篇章，並未有系統的闡述，不過綬甲從游述祖日久，於其古文字學有整體認識，尤其是述祖關於文字源流正變之敘述，給與綬甲相當大的啓發。如在給孫星衍的信中，以篆、隸變遷爲例所做古、今書體變化規律的說明，即展現出其對文字發展史的深刻認識¹⁷⁶。另外，綬甲關於文字源流正變的系統著作，厥爲《釋書名》，是書頗融述祖觀點於字裏行間之中。且看譚獻的介紹：

《釋書名》，源流晰，正變詳，可教學子辨正秦篆，諍及許書，謂有秦隸、有漢隸、有八分、有章艸，皆如金湯之固。斷王次仲爲漢人，持論亦堅。¹⁷⁷

辨正秦篆，諍及許書，正是述祖欲重建古文字系統所必須掃平的障礙，而綬甲持論如此，正是受述祖影響的顯證，譚氏之評論可謂掌握了重點。事實上，述祖的觀點，亦爲逢祿、翔鳳所承襲。如劉承寬述其父云：「府君復從受《夏時》等例及六書古籀之學，盡得其傳，學益進。」「大抵府君于《詩》、《書》大義及六書小學，多出于外家莊氏。」「至于近世小學，但知溯源小篆，而古籀幾爲絕

¹⁷⁵ 莊述祖：〈復從子卿珊詢古文大小篆書〉，卷6，頁26a-b。

¹⁷⁶ 莊綬甲：〈上孫觀察星衍書〉，頁45a。

¹⁷⁷ 譚獻：《復堂日記》，卷7，頁10b。

學。」¹⁷⁸ 蓋言逢祿六書古籀之學受之於莊氏，而不滿於世之言小學者只知溯源小篆，使古籀幾為絕學也。至於翔鳳，今觀其〈書鐘鼎字源後〉云：「夫三〈蒼〉既作，古文滅絕，近工徒隸之書，遠昧形聲之指，八體攸分，號為奇字，爾雅之士，尋其偏旁，辨其通假，六書之義，宜亦粲然，未可奇矣。」¹⁷⁹ 又題〈宋湘陰縣得古鐘歌用昌黎石鼓詩韻〉云：「後儒紛紛習徒隸，古文滅絕誰相磋。」¹⁸⁰ 蓋亦不滿於後儒只知辨證徒隸，溯源小篆，使古籀之學瀕於滅絕之境遇。只不過逢祿、翔鳳雖言之鑿鑿，卻並未如綬甲，有系統之著作。今引綬甲《釋書名》一段，以見其議論特色：

《周禮》八歲入小學，大司徒教鄉三物，書在六藝，保氏掌養國子，教以六書。外史掌達書名，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文乃滋盛。宣王大史籀著文十五篇，與古或異。自諸侯立政，去其典籍，七國禁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于是始皇使下杜程邈定書，而篆書出焉。李斯作〈倉頡〉七章，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皆取〈史籀篇〉，或頗省改，謂之小篆，遂謂倉史舊文為大篆。……大、小云者，推所自出也。〈倉頡〉、〈博學〉皆篇端命題，〈倉頡〉者，追創造之祖也；〈博學〉者，示學童以博文也；〈爰歷〉猶為爰書也，于獄吏用之。爰者，換也，文書換其口辭，以訊鞠論報也。以獄制書，即以書斷獄，所謂教胡亥書及獄也，是為秦篆。程邈又增減大、小篆方圓而為書三千，始皇名之曰隸書，謂施諸徒隸也。時官獄務繁，苟趣省易矣。亦曰佐書，篆書之捷，所以為佐也，是為秦隸。經傳以來曰文、曰書、曰名而已，未有異號，秦既興隸，迺為篆稱，體繁而名熾焉。¹⁸¹

蓋其造語雖平易，未如述祖之上下抑揚者，然仍可見其承述祖之跡。於古文篆籀徒隸之演變，詳引群籍，持之有故，非空言議論而已。故徐震〈釋書名序〉評之曰：

莊卿珊……《釋書名》一卷，自文字肇端、六書指例、字體嬗衍、字學要籍，以至簡編筆札紙墨之屬，咸有訓解，類聚群分，有似〈急就〉，而不為

¹⁷⁸ 劉承寬：〈先府君行述〉，卷11附錄，頁7b-8a。

¹⁷⁹ 宋翔鳳：〈書鐘鼎字源後〉，《樸學齋文錄》，卷2，頁21a。

¹⁸⁰ 宋翔鳳：〈宋湘陰縣得古鐘歌用昌黎石鼓詩韻〉，《憶山堂詩錄》，卷3，頁13a。

¹⁸¹ 莊綬甲：《釋書名》，頁2a-3a。

韻語，循音索義，同於《釋名》，而考訂特詳。標指歸於正文，附疏證於注釋，體約而賅，辭雅而顯，信足昭源流、曉學者矣。自魏、晉以降，隸、楷、八分、正書，數者稱名樊然，錯雜難辨，先生旁攬舊說，定厥是非，凡所折中，靡不諦當，全書之中，斯為尤精善者。¹⁸²

莊綬甲所有著作，惟此編收入後人所輯叢書中，由此亦可以推見其價值。又王大隆〈釋書名跋〉云：

右《釋書名》一卷，清莊綬甲撰。……於文字源流，旁及簡策縑紙之屬，靡不徵引廣博，剖析詳明，足為治小學者之津逮。¹⁸³

二家之說，蓋僅專從其於文字源流之考釋見其書學史之功績，又因條件所限，未能遍觀莊氏遺著，以致未能見是書之作，乃承述祖古文字學觀點者。極而論之，述祖古文字學觀點，一如其《夏小正》、《尚書》之學，所以推闡存與聖王天道之說，此為研究常州學派三代傳承之軌跡者所不得不知者。

四、結論

本文之目的，在於藉由釐清莊綬甲的生平交遊，及其對父、祖學術之整理傳承，來觀察常州學派的一個學術側面。從莊綬甲的交遊來看，嘉道之際的常州，可謂人文匯萃，學者輩出。然而這些人並非孤立的個體，而是總角相交，結社學習，既砥勵志業，又鑽研文章，展現出一種亟為世用的企圖心，形成複雜的關係之網。這是常州的整體風氣，莊氏家族亦無法自外於此。只不過，與專注在詩詞、散文上推銷價值理想的常州同行稍有不同，他們將經世的理想，轉化為對經典境界的描繪，以探索聖人之於天道為研經之首務，企望藉由純化學術以達於純化政治的目的，這是莊氏學術特有的經學政治觀。以此為前提，家族特有的經典解釋傳統於焉誕生。

但是，擺在莊綬甲面前的，是一個沒落的家族，一堆零亂的遺稿，所以奔走謀食、整理刊刻，就成為他的生活重心。筆者常在思考，要成為一個學派，至少應具備三方面的條件：其一，要有明確的學術宗旨；其二，要有明確的傳承譜系；其三，要有系統性、累積性的研究成果。這三點，不論從綬甲的師友交遊來看，還是從他對家學的整理保存來看，都有豐富的文獻可資佐證。進一步來說，

¹⁸² 徐震：〈釋書名序〉，同前註，卷首，1a。

¹⁸³ 王大隆：〈釋書名跋〉，同前註，附錄，13b-14a。

以莊綬甲為切入點，側面來剖析常州學派，也為我們帶來豐富而罕見重視的學術內涵，亦即在眾所周知的《春秋》學視野之外，還有一條由古文字學入手，譜系明確的《尚書》學傳承，這是研究常州派，尚有待開發的一環，也將是挪開今文學框架，最有力的依據。進一步來說，透過對莊綬甲交游學行的考察，更能為考據學在清代中葉的擴散，作出具體的說明，有助於對考據學在清代中葉以下的影響力，進行更精確的評估。

最後要說明的是，莊綬甲的學術內涵並不突出，不具有高度的原創性，在思想史或是經學史的敘述中，很難找到他的位置，但是透過學術史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一幅莊氏學術開展傳播，並且與考據學展開對話的畫面，可以作為清代中葉經學史的一個側面觀察，而這正是筆者致力於將經學史的研究納入學術史視野的根本原因。

莊綬甲與常州學派

蔡長林

在常州學派學術群體的序列中，莊綬甲向來不在學者關注的視野之內。的確，與莊存與、莊述祖、劉逢祿乃至宋翔鳳相較，作為護持家族學術最力的第三代子弟，莊綬甲的學術內涵並不突出，不具有高度的原創性，在思想史或是經學史的敘述中，很難找到他的位置。然而莊綬甲用心保存家族學術的相關記載，卻保存了下來。如何讓這些文獻成為研究常州學派的重要資源，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任務。在透過經學史與學術史的結合，對莊綬甲的學行經歷作一番考察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一幅莊氏學術開展傳播，並且與考據學展開對話的畫面，以及常州學派在眾所周知的今文《公羊》一系學術之外，尚有一條清晰的、以古文字學為基礎的《尚書》學路線。因此，研究莊綬甲，既可以作為清代中葉經學史的一個觀察側面，更可以為吾人思考常州學派的複雜性，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

關鍵詞：學術史 莊綬甲 常州文人 《尚書》學 考據

Zhuang Shoujia and the Changzhou School

TSAI Ch'ang-lin

In academic treatments of the Changzhou school, Zhuang Shoujia has never been within the field of vision of scholars. Indeed, when compared to figures such as Zhuang Cunyu, Zhuang Shuzu and Liu Fenglu, the third-generation disciple Zhuang Shoujia, despite his fierce devotion to guard the lineage scholarship, seemed less substantial in scholarly achievement and lacked creativity. In the discussions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or of classical studies, it is hard to find a place for him. However, Zhuang Shoujia carefully preserved materials that were relevant to the family research, and they are extant. It is a challenging job to contextualize these materials with other important sources of the Changzhou school.

After looking into Zhuang Shoujia's life and work in the light of classical studie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we can view the development and propagation of the Zhuang family scholarship, which engaged the so-called evidential scholarship in a dialogue. Moreover, we learn that other than the well-known *Gongyang* "modern text" scholarship of the Changzhou school, there was also a recognizable phil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school that was based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Research into Zhuang Shoujia can not only contribute to observations about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tudies in the mid-Qing, but also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hangzhou school.

Keywords: the history of thought Zhuang Shoujia
Changzhou literati *Book of Documents* studies
evidential scholarship